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3年3月号

金融与发展

对克里斯蒂娜·罗默的采访

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输出量激增

墨西哥贸易复苏

中东 聚焦未来

Jeffrey Hayden

主编

Marina Primorac

责任编辑

Camilla Andersen

James L. Rowe, Jr.

Hyun-Sung Khang

Simon Willson

Natalie Ramirez-Djumena

高级编辑

Glenn Gottselig

网络编辑

Khaled Abdel-Kader

Jacqueline Deslauriers

Maureen Burke

Lika Gueye

助理编辑

Lijun Li

印制/网络产品专员

Sara Haddad

媒体经理

Nicole Braynen-Kimani

高级编辑助理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Seemeen Hashem

Michelle Martin

Kenneth Nakagawa

美术设计

编辑顾问

Bas Bakker

Thomas Helbling

Nicoletta Batini

Laura Kodres

Helge Berger

Paolo Mauro

Tim Callen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Paul Cashin

Paul Mills

Adrienne Cheasty

Martin Muhleisen

Alfredo Cuevas

Laura Papl

Marcello Estevão

Uma Ramakrishnan

Domenico Fanizza

Abdelhak Senhadji

James Gordon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 版权所有，IMF 2013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8300

传真：(202)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特辑

中东：展望未来

8 实现共同繁荣

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必须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明确指导目标

马苏德·艾哈迈德

14 自由与面包可以兼得

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变革同步实施

马尔旺·马沙尔

18 但求公平

阿拉伯经济改革必须以社会公正为根本出发点

纳达·纳什夫、扎菲里斯·察纳托斯

22 金融方面的思考

为了帮助推动经济增长，阿拉伯国家需要稳定的资金供应和更好的信贷获取渠道

阿道夫·巴拉加斯、拉尔夫·恰米

26 观点：不同以往

在新兴中产阶级的推动下，私营企业对中东地区顺利的民主过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瓦里·纳萨尔

30 直言不讳：把握契机

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实现其社会急需的基础广泛的增长

大卫·利普顿

32 图表释义：贸易、增长与就业

加强贸易一体化有利于中东地区的增长与就业

艾敏·玛蒂



8



26

本期还有

34 非常规油气开采蓬勃发展

由于高价格和新技术的应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撼动全球能源市场

托马斯·何浦林

38 因不确定而掣肘

工商界和消费者因对未来不确定，造成经济复苏进程放缓

尼克拉斯·布鲁姆、M.阿汗·科斯、马可·E.特隆尼斯

42 发展的程度

新的数据表明，一个国家公务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拉巴·阿瑞兹克、马克·昆廷



34

全速前进

当本杂志上次关注中东和北非地区时，发现该地区处在变革的边缘。两年前，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受其理想和向往更好生活的愿景驱使冲破束缚，引发了一场社会运动，同时也激励了全球民众。

在埃及、约旦、利比亚、摩洛哥和也门，即处于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人们拥护变革，迈进新纪元。目前，这些国家正全速前进，奔向未来。

在这些国家成功地挥别过去之际，要想找到一条通往前方的道路却并不容易。处于转型中的国家面临着稳定其经济和政治体系以及实现其国民的期待和希望的艰巨任务。在去往何处与如何到达目的地之间存在矛盾，而且不稳定依然存在：就在本期杂志准备付梓之际，埃及的示威游行被武力镇压，武装冲突仍然继续影响着叙利亚。该地区的经济举步维艰。

对于一本季刊来说，将针对这个处于快速变革时期的地区的相关文章放在一起，是一种挑战。本期《金融与发展》探讨其变革面临的困难，关注形成该地区经济的根深蒂固的、长期存在的势力，并提供了实现强有力的、包容性的增长的选择。

IMF中东和中亚部主任马苏德·艾哈迈德 (Masood Ahmed) 为实现该地区经济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制订了议程。马尔旺·马沙尔 (Marwan Muasher) 论述了经济发

展与政治变革的相互关系。在“观点”栏目，瓦里·纳萨尔 (Vali Nasr) 强调中小型企业在成功的民主转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本期“直言不讳”栏目中，IMF副总裁大卫·利普顿 (David Lipton) 提出论点认为，只有开放才能使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实现广泛的增长，而这正是其社会所极度渴望的。

此外，在本期杂志，我们还关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以及这将如何撼动全球能源市场。我们还采访了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设计者克里斯蒂娜·罗默 (Christina Romer)。

杰里米·克里夫特 (Jeremy Clift) 从2008年起开始担任本杂志的主编，现任IMF出版局局长。从本期开始，我将从他手中接任主编一职。在杰里米任主编期间，他带领《金融与发展》迈向一个新的领域，包括在脸书 (Facebook) 上开设账户，现在我们已经拥有75,000个粉丝，共同讨论全球经济问题。

我希望能够延续《金融与发展》的优良传统，并与本刊的各位优秀人才一起努力，为各位读者呈现出一系列有关全球经济的、有深度且令人兴趣十足的文章。

杰弗里·海登 (Jeffrey Hayden)
主编

- 48 失而复得
竞争力的恢复有助于墨西哥重新获得被中国占领的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
赫尔曼·卡米尔、杰瑞米·祖克

其他内容

- 2 简讯
- 4 经济学人物
7,870亿美元的问题
莫琳·伯克对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的采访
- 46 回归基础
什么是结构性政策？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于应对短期经济波动，但有些经济问题是深层次的
卡雷德·阿卜杜勒-凯塔
- 53 书评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战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创建新的世界秩序》，本恩·斯泰尔
《银行家的新装：银行业，你怎么了？我们该拿

你怎么办？》，阿娜特·阿德迈提、马丁·赫尔维希
《印度电话大全》，罗宾·杰弗里、阿萨·多伦

57 数字聚焦

具有包容性的非洲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获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
卢卡·艾瑞克、格伦·艾美芝克和亚历山大·玛沙拉

插图：第42—43页，Seemeen Hashem/IMF。

摄影：封面，Maya Alleruzo/AP/Corbis；第2页，Salem Krieger/Corbis，Michael S. Yamashita/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Corbis，Philippe Lissac/Corbis；第3页，Imaginechina/Corbis，Michael S. Lewis/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Corbis；第4页，Noah Berger Photography；第8页，Luis Otero/Hemis/Zumapress.com；第8—9页，iStockphoto.com/Lorna Piche；第10页，Mohammed Vifo/UPI/Newscom；第12页，Chokri Mahjour/Zumapress.com；第14页，Adham Khorshed/Demotix/Corbis；第18页，Ali Arkady/Metrography/Corbis；第22页，Bilal Hussein/Associated Press；第26—27页，Dirk Panier/arabianEye/Corbis；第30页，Michael Spilotro/IMF；第32页，Kadari Mohamed/Xinhua/Zumapress.com；第33页，Phil Weymouth/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第34页，Orlin Wagner/Associated Press；第38页，iStockphoto；第48页，Keith Dannemiller/Corbis。

欢迎在线阅读本刊：www.imf.org/fandd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不再浪费，不再缺乏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环境规划署（UNEP）及其合作伙伴在 2013 年发起的一项旨在减少粮食浪费的全球运动指出，消费者和食品零售商通过采取简单行动便可大幅减少每年多达 13 亿吨的粮食损失和浪费。

根据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在粮食生产和消费系统中损失或浪费的粮食约占全球粮食产量的 1/3，价值在 1 万亿美元左右。粮食损失主要发生在生产阶段——收获、加工及分销，而粮食浪费通常发生在食品供应链上的零售商和消费者一端。



这项主题为“思考、行动、节约：减少你的食物印迹”的倡议旨在

协调各种行动，并为世界各地此类小规模倡议提供一个全球视野。这场新的倡议专门针对来自消费者、零售商和酒店业的粮食浪费现象。

“对于一个人口多达 70 亿并将在 2050 年增至 90 亿的世界而言，浪费粮食是毫无道理的——无论是从经济、环境还是道德角度来看，”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说。

全球粮食系统对于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产量超过消费量的情况只能加重这种压力。报告称：

- 超过 20% 的耕地、30% 的森林和 10% 的草地正在退化。
-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30% 以上来自农业和土地使用方面的变化，如森林砍伐。
- 约有 30% 的海洋鱼类种群被认为过度开发。



2011年3月日本海啸及地震后的废墟。

灾害风险管理

亚洲开发银行（ADB）新的一项报告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灾害损失的上升速度高于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

投资于灾后恢复力——确保能抗击灾害的未来（Investing in Resilience—Ensuring a Disaster-Resistant Future）指出，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灾害风险融资工具，例如灾难基金、税收抵免、巨灾债券，以增强灾后恢复能力。

“亚洲的经济成果正在被灾害所侵蚀，而灾害常常袭击最贫困、最困难的地方，”亚行主管知识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副行长宾度·罗哈尼说。

报告称，大量投资以增强灾后恢复能力能够扭转这一趋势，但仍有很多隐藏在日渐增加的灾害损失下的障碍，例如风险数据的不完善、软弱和不恰当的激励、匮乏的立法和监管框架、有限的资金以及权力的不对等。

灾害风险融资工具对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来说尤为重要，在发展抗击灾害的创新融资方面，该地区大大落后于其他地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中仅有不足 5% 的灾害损失受保，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受保比例达到了 40%。

灾害损失在亚洲增长很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环境退化、气候变化、人口压力以及在很多重要的发展投资项目的设计和选址时没有考虑灾害风险。

汇款回国的成本太高

汇款的平均成本从当前的 12.4% 降至 5%，将为非洲移民及其依赖汇款为生的家人节省 40 亿美元。

在海外务工的非洲劳工 2012 年汇回母国的汇款额达到 600 亿美元左右，而他们支付的汇款成本大大高于其他移民群体。根据世界银行“向非洲汇款”数据库的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接受汇款费用最高的地区。而向非洲汇款的平均成本高于 8.96% 的全球平均水平，几乎高出南亚汇款成本的一倍——南亚是全世界汇款



成本最低的地区（6.54%）。

接收汇款往往是收款人使用的第一项金融服务，然后他们就有可能使用其他金融服务，例如在银行开立账户。因此，降低汇款成本能够推进非洲的金融包容性（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具有包容性的非洲”）。

非洲国家之间的汇款价格甚至更高，南非、坦桑尼亚和加纳是非洲地区汇款费用最高的国家，平均而言分别为 20.7%、19.7% 和 19.0%，其主要原因是跨境汇款市场缺乏竞争。

2013年大记事

3月14日—17日，巴拿马巴拿马城
美洲开发银行年会
4月19日—2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与IMF春季年会
5月2日—5日，印度新德里
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5月10日—1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
5月30日—31日，摩洛哥马拉喀什
非洲开发银行年会
6月17日—18日，英国费马纳郡
八国集团峰会
10月11日—13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与IMF年会

辍学危机

美洲开发银行（IADB）正在发起一项倡议，旨在呼吁拉丁美洲大众正视高中辍学危机以及协助将青年学子留在校园。该项名为“毕业—21”（GRADUATE XXI）的倡议通过大众媒体、电影及交互式在线论坛，目标是带动拉丁美洲大众认识此项议题，共同努力提升该地区的高中毕业生人数。

最近几年，拉丁美洲地区的入学率大幅上升。小学教育为国民义务教育，已基本普及化。然而，该地区有近半数的高中生未能完成学业。社会经济地位、民族群体以及城乡差异仍然持续地影响着入学率。

IADB指出：

- 在农村地区，超过半数的青少年未能读完九年级。
- 12—17岁的原住民青少年中，超过40%未在学校就读。
- 该地区仅有20%—30%的残疾儿童和青少年就学，但其中大部分未能完成学业。



秘鲁的学生：入学方面的差距在拉丁美洲持续存在。



中国抚顺，该市正高速发展。

构筑可持续城市

世界银行一项新的报告《规划、连接和融资——立即行动：城市领导者须知》指出，如果目前对基础设施、住房和公共服务的投资有效且可持续，那么发展中经济体快速的城市化将有利于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长期发展。

“发展中世界的很多城市中心正在形成，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但却有限的机遇建造鼓励包容性的绿色增长及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智能城市，”世界银行城市和灾害风险管理主管邹比达·阿拉瓦说。

未来20年，将有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追寻自己的梦想，城市人口预计将新增20亿，其中超过90%将出现在发展中世界。然而，发展中经济体的许多城市目前就已经在提供诸如水、电、交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基础需求方面面临困难。

这项在1月份召开的全球能源巴塞尔会议上发布的报告为地方官员提供了政策指导，以创造发展所需的就业、住房和基础设施，在现在和未来将城市建设成为繁荣中心。

本报告还指出，新的城市增长将不太可能发生在诸如里约热内卢、雅加达和新德里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在那些不被人们所熟知的“二线”城市，如安哥拉的万博、中国的抚顺和印度的苏拉特。

7,870亿 美元的问题

莫琳·伯克对美国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前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的采访

克里斯蒂娜·罗默在2008年11月意外地收到一封邮件，发邮件的人想和她谈关于新当选总统的过渡班子问题，她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理睬。她想，这个人也许认为她与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有关系，想让她帮忙找个工作。

但她的丈夫戴维（是和她一起工作的一位经济学家）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发件人迈克尔·弗罗曼的信息，然后对克里斯蒂娜说：“你也许应该给他打个电话，他是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新政府过渡期间经济工作班子的负责人。”

罗默和她的丈夫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也都是奥巴马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克里斯蒂娜（朋友称呼她“克里斯蒂”）除了为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奥斯坦·古尔斯比准备过一些简报备忘录以外，并没怎么参与过竞选活动。所以当她在芝加哥会见候任总统奥巴马，讨论由她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事时感到很惊讶，她说：“那次经历很离奇而且还有些令人胆战心惊。”

会见发生的背景是，美国财政不稳定情况持续上升，从抵押信贷市场扩散开来，几乎导致全球恐慌。两个月

前，最大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在美国历史上是最大的公司破产事件。几周后，纽约股票交易市场遭遇了几十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信贷市场被冻结。接下来劳动统计局报告指出，十月份美国丧失了24万个就业机会，这是金融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的信号。

会谈一开始，奥巴马就说货币政策已经起不到解决经济危机的作用了，因此采取财政政策是唯一的选择，该政策包括税收和消费两个方面。虽然罗默同意财政刺激是必要的，但是她的学术身份让她不得不对总统说法的前提表示异议。她告诉总统：“即使利率率降到接近零，美联储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它仍然有许多事可以做。”罗默研究过货币扩张政策是如何使美国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根据她的研究，两人谈到了政府可采取的手段，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75年前做了什么正确的决策。罗默回忆说：“我很惊讶奥巴马对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知道得如此之多，与他的讨论也是难以置信的理智。”

奥巴马当场就请她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她也当场接受了。11月30日，仅仅在选举的三个半星期后，她就去了华盛顿特区。接下来的一个

月格外混乱匆忙，因为他们得举家搬迁、给戴维找工作、给他们最年幼的孩子 12 岁的马修找学校、租房子。

后来罗默问拉姆·伊曼纽尔，时任奥巴马的幕僚长，为什么找她担任这个职位。现任芝加哥市长的伊曼纽尔告诉她：“这很简单。你是研究大萧条的专家，我们想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专家。”

把“金子”变成“铅”

像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那样，罗默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大萧条的起因和对大萧条起作用的政策。虽然她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货币政策上面，但是研究结果还是让她相信政府对稳定经济有作用。所以自大萧条后，国家面临最糟糕的经济危机期间，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罗默主张政府迅速行动从而形成了 2009 年巨大的刺激计划，也就不足为奇了。

罗默对经济衰退问题感兴趣，部分原因是来自她的个人经历。她生于伊利诺伊州奥尔顿郊区的圣路易斯。父亲是化学工程师，母亲是教师，后来随家庭搬到了位于美国工业中心、俄亥俄州的制造业重镇坎顿。20 世纪 70 年代上高中的时候，她目睹了该区域经济下滑的状况，伴随而来的就是 1973 年石油价格暴涨，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她说：“经济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看到了周围发生的一切，因此让我觉得研究经济问题很重要，”这促使她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和玛丽学院上学时把经济学作为她的主修课。

1983 年春天，罗默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她亲身感受到了经济衰退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她父亲失业，不久后母亲又听说自己的教师工作下一年要被解除。多亏了赫赫有名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罗默的学习经费才有了保障。但是她担心经济衰退会影响她和同窗好友戴维·罗默准备在当年八月份举行的婚礼。她父母安慰她说为了她的婚礼存了钱，而且她妈妈和姨妈们都投入进来帮忙准备婚宴和鲜花，婚礼得以如期举行。但是她仍然说：“这是一个影响重大的成长经历。”

罗默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专家彼得·泰明讲授的一节课上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作为特明教授的 research assistant，罗默开始对历史数据着迷。当时在宏观经济学家中流行的看法是：二战后美国的经济要比战前几十年里稳定得多，因此导致许多人断言决策者们已经能够熟练运用货币和财政手段来稳定经济。但是收集和计算诸如实际 GDP 和失业率等宏观经济表现指标的现代技术，从二战后才刚刚兴起。用来做比较的战前的经济数据大多是通过把一些假设数据拼凑起来得到的，结果就很难说究竟是商业周期真的变了，还是只有数据结构变了。

因此，凭着她反直觉的才华，罗默将战前用来计算失业率和产量的方法用于统计战后阶段的经济数据，此法被泰明教授称之为“反向炼金术”。她是把“金子”（良好的战后数据）变成“铅”（用得到战前数据同样的方法创造的战后数据），而不是把“铅”变成“金子”。这项研究为她的博士论文奠定了基础，而且揭示了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经济状况几乎与二战前几十年（不包括大萧条时期）里的同样不稳定，这显然违背了传统观点。

罗默说：“对宏观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的简单描绘仅仅是一个虚构的数据。”

劳伦斯·鲍尔，罗默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经济学。他说罗默的论文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她的论文使一些人受到威胁，因为她动摇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是件好事的依据。”他回忆说，“这的确有些讽刺意味，因为罗默如今正是经济刺激及积极政策的倡导者。”

罗默在后来的很多论文中辩解道，经济缺乏稳定并非说明货币和财政政策不重要，而是问题出在没有利用好这些工具。过度的经济扩张政策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导致利用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罗默说，“战后初期，很多研究都在继续。”

她说，那些年代和那些人让就学于麻省理工学院无比令人兴奋。美联储实施了专为消除 20 世纪 70 年代末高通胀而设计的货币紧缩政策之后，国家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罗默回忆说：“当宏观经济变得很脆弱时，我们直接地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她的观点得到了许多杰出的教职人员的认同，如史丹利·费舍尔和已故的卢迪格·杜布斯（杜布斯与泰明教授同时担任她的论文顾问）以及周围的同学圈子，其中就包括鲍尔和格雷戈里·门克维，门克维现任哈佛大学教授，是在罗默之前担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罗默夫妇 1985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他们转去了伯克利大学。

记叙法

罗默的研究大部分是和她丈夫一起完成的，研究反映出她早期对经济史的强烈爱好。他们工作的一项基本特征就是使用“记叙法”，即不仅从统计中找证据，而且从历史中找证据。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他们 1963 年的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 年》中首先使用了这种方法。

在一篇 1989 年发表的影响深远的论文《货币政策重要吗？本着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精神的一项新试验》

全面考虑

罗默说，估计财政政策的影响很困难，因为财政措施常常是为了响应经济中的其他问题而采取的。罗默于2011年在汉密尔顿学院对学生们说，把其他因素的影响与税收变化的影响或者开支决策的影响分开需要复杂的技术，而且要通过有创造性的和辛苦的工作来完成。

以2008年2月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为例，实施该政策的原因是两个月前发生的经济衰退。减税是以2008年4月到7月间寄出的退税支票为主要形式。

罗默说，当退税支票到来的时候，家庭收入明显提高。可是消费并没有增长，反而稍有下降。乍一看，退税似乎没起作用。

但是国会批准退税政策并非无缘无故，它是在次贷危机最严重、房价暴跌时决定的。大多数人的主要固定资产是房子，而当房价下跌时，人们倾向于节约开支，罗默解释说。

“针对此种情况，在退税措施实施期间消费保持稳定也许正说明了退税政策是多么有效，”罗默肯定地说，“虽然房价猛烈下跌，退税却使消费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

罗默说，最重要的教训是，不能只看结果就推断退税政策或其他任何政策所带来的效果。你必须考虑到在没有该政策的情况下经济状况的走向。

“经济学家给这个问题起了个名字叫：遗漏变量偏差。”罗默说，“任何时候，当你在观察两个变量的关系时，如：消费者开支和退税的关系，你必须考虑到第三个变量，诸如财富的流失，对前两者都产生影响。”

她特别指出，遗漏变量偏差是经济学实证性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中，罗默夫妇使用记叙法，把战后这一时代划分出七个时段，当时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出于对通货膨胀的忧虑，试图用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放缓。在每个时段中，他们都发现，美联储的政策导致的结果都远远低于政策改变前预期的发展效果，前提是假定货币政策中变化的“决定性证据”对实体经济至关重要。

这项研究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罗默夫妇在划分和分析这七个时段时，详细地阅读了40年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一个会议记录和其他记录，认真领会美联储的目的，了解制定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

虽然运用起来很复杂，但是记叙法比纯粹统计法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提供“附加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解决在研究货币因素与实际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出现的定向问题，”罗默夫妇（国家经济研究局货币经济计划的共同负责人）写道。

最近，罗默夫妇运用这一方法测定了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他们从所有工作中得出一个主要结论：一项政策所带来的效果是无法通过只看结果来推

断的，必须考虑到经济中出现的其他情况以及采取政策的原因（见专栏）。

多少算太多？

在2011年伯克利大学的毕业典礼上，罗默告诉毕业生：“在白宫的工作简直就是她从来没有做过的最艰苦的工作，但是那两年对她的一生来说也是最重要而且最有意义的”。那个阶段非常困难，部分原因是她的丈夫不再和她一起共事，丈夫作为访问学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两人就职于不同的机构，不仅停止了每日的合作，而且由于政府的保密纪律，他们甚至不能开口讨论她的工作。她怀念那些与丈夫——一位近30年来她最信任的人——总是就某事展开充分探讨的日子。

每天工作14小时，所做的工作也是难以置信的紧张。刚到华盛顿特区的时候，罗默和奥巴马经济过渡班子的其他成员就立刻开始了工作。2008年12月，她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从各种来源中把作为政策响应出发点的所有预测分析汇总起来，这些信息有的来自美联储，有的来自一些私营机构的分析师。然而几乎所有这些预测分析都低估了新政府即将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只是眼看着这些预测分析显露的状况在眼前恶化，”罗默回忆说，“随着得到的数据越来越多，经济衰退的严重性越来越清晰可见。”

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下，奥巴马的新经济团队于11月下旬感恩节假期一过就开始着手计划一项应对政策。这个团队成员包括：受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劳伦斯·萨默斯），财政部负责人（蒂莫西·盖特纳），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负责人（彼得·奥斯泽），以及罗默。大家都同意，经济需要一套刺激措施，但对具体达到什么规模才合适仍有争论。

诺姆·希伯在他《逃跑的艺术家——奥巴马团队是怎样摸索恢复经济的》一书中讲述，罗默估计一套刺激措施（包括：消费、税收以及联邦与地方的分配）需要1.8万亿美元，才能全面消除经济正在生产什么和有潜力生产什么之间的差距。这些推算促使了这套刺激措施规模的增大，但是，只有四项方案（涉及金额范围从5,500亿美元至8,900亿美元不等）被写进了经济团队致奥巴马总统的备忘录中。

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即：7,870亿美元财政刺激法案。虽然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财政刺激措施，但只是罗默提出的1.8万亿美元的一半。

罗默承认，因为危机的严重性是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个较小的刺激措施也许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选择。

然而，现在看来很清楚：“更多（超过 7,870 亿美元）的刺激数目肯定会更好。我们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当时我们没那么有钱。”

艰难的位置

最让罗默对于任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感到遗憾的是，她在 2009 年 1 月与杰瑞德·伯恩斯坦（候选副总统约瑟夫·拜登的经济顾问）一起发表的一篇报告。罗默-伯恩斯坦报告提出了一个支持财政刺激的论据，目的是说服国会和公众相信，强大的刺激是必要的。罗默和伯恩斯坦写到：提议约 8,000 亿美元的一套刺激方案，可保证失业率上升不超过 8%；而如果不采用，失业率则会达到 9.1%。当失业率最后高达 10% 的时候，许多保守派抓住了罗默和伯恩斯坦的把柄，认为这表明了刺激政策没起作用。（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还在争论说，如果没有刺激政策，失业率也许还会上升得更高。罗默和伯恩斯坦的真正错误就在于他们的预测底线过于乐观。）

“缺乏经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形成论据的过程，”罗默说，“我喜欢这样的想法，就是提供信息并尽量说明我们为什么建议采取这样一个特殊的政策行动。但当我们在想怎样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应该有更多的政治考量。”

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岗位上经过了近两年的艰辛工作，罗默于 2010 年 9 月辞去了她的职位。两年约是这一职位的标准任期。有推测说，她决定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奥巴马政府为时过早的从刺激政策向着重削减赤字的政策转变，使罗默感到受挫。或者是由于与萨默斯的分歧导致辞职。罗默在麻省理工学院上学时就认识了当时在那里执教的萨默斯。但是罗默否认了那些推测，她说她辞职是为了全家可以搬回加利福尼亚去，让她最小的儿子在那里上高中。

“有传闻说，我离开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与拉里·萨默斯相处。所以当我离职的消息宣布后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说，‘不，我非常喜欢拉里·萨默斯；我离职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结果蒂姆·盖特纳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听着，如果你不说些我的好话，他们会认为是我把你轰走的。’”罗默轻声笑着说。

很“酷”的原因

罗默很高兴回到伯克利大学，她的第二个孩子保罗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现在开始在那里读化学博士学位（她最大的孩子凯瑟琳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生物学博士，马修现在读高中二年级）。

回顾在华盛顿特区的那段时期，罗默对同时兼顾

白宫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困难程度惊叹不已。她说：“简直就没有办法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在进入过渡班子一个月后，罗默记得，她是在圣诞节前两天才筋疲力尽而且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

罗默回忆说：“我们的两个大孩子回家后，装饰起一棵圣诞树，烤了饼干，而我什么礼物都没有准备，只是说，‘真对不起，’他们回我：‘妈妈，没关系。你让我们变得很酷。’我猜是由于为奥巴马总统工作才弥补了很多。”

回过头看，事实证明：“数目更多（超过 7,870 亿美元）肯定会更好”。

罗默仍然通过星期天《纽约时报》中的一个“财经观察”专栏关注着公共领域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栏目中，她和其他五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交替地撰写文章。目前来看，这样的公众曝光率刚刚好，她说：“我仍然关心许多政策问题，而且专栏像个论坛，人们可以在那里进行认真的辩论、提出依据。”

依然让罗默深感头痛的问题是美国的失业率（2013 年 1 月为 7.9%）。在最近一期栏目里，她探讨了美联储怎样才能使促进增长的政策更有力。她说，目前的失业问题需要大胆的解决方案，例如一条以名义 GDP（经济体的美元总值）为目标的道路。这实际上意味着，美联储将承诺不惜一切代价使名义 GDP 回到危机前的轨道上来，以改善对未来增长的预期，即使这意味着放弃目前的谨慎路线。“如果克里斯蒂负责美联储，她会做些非常关键、果断的事，”鲍尔说，“她一直对高失业率的糟糕状况直言不讳，而且说得恰如其分。”

罗默认为，教育民众懂得经济问题很重要。“事实是，无论是讨论货币政策还是财经政策都是很复杂的。”而部分问题是政治家们都倾向于过分简单化。

“他们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减税，而减税就能对付预算赤字。’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同样，民主党人也这么说：‘只要提高对富人征税，我们就可以保持补贴计划。’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富人也没有那么多钱来支付全部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她说。

罗默利用演讲、报纸专栏和她的教学职位，传达她对本国面临的复杂经济挑战的观点。“如果你愿意花时间，以一种让不懂经济的人都明白的方式讲解，我想你最后肯定能成功。”

永远的教师，罗默似乎回到了本应属于她的位置上。■

莫琳·伯克（Maureen Burke）是《金融与发展》编辑部工作人员。



实现 共同 繁荣

马苏德·艾哈迈德

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必须建立一个
面向未来的明确指导目标



埃及亚历山大地中海海岸。

从一个人的回答可以看出他是否聪明，而从一个人的提问可以看出他是否睿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著名作家
纳吉布·马哈福兹

2011年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变革曾一度引发人们对该地区的未来发展状况表示乐观，而现在很多人不知道阿拉伯世界将走向何方。

中东地区的转型为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这些国家不仅开始反思其政治体制，同时也开始反思其经济体制。部分阿拉伯国家已经历了政权的更迭（如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也门），其他阿拉伯国家正在开展内部的政治改革（如约旦、摩洛哥）。所有这些国家都可以从全面改革中受益，创建更有活力和包容性增长的经济体，为各个社会阶层提供经济机会。

建立明确的指导目标

对处于过渡期的阿拉伯国家而言，2013年又将是一个艰难之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只可能适度复苏，不足以创造为应对该地区严重的失业问题所必需的就业机会。叙利亚的流血冲突正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波及周边国家，特别是约旦和黎巴嫩。

尽管目前关注于维持该地区经济的稳定性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该地区各个经济体在现代化和多元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及为所有人提供公平公正机会方面所面临的更为根本性的中期挑战。焦躁不安的人们对立竿见影的成效（更多新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社会状况）日益增加的期望，成为决策者积极改变现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刺激因素（见本期《金融与发展》，“自由与面包可以兼得”）。

一个全面的改革方案必须具有明确的经济转型目标。在20多年前的东欧地区转型期间，很多东欧国家转向了欧盟及其经济发展模式。与之不同的是，如今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缺乏一个实现其最终经济目标的明确发展模式。不过，如同划艇的桨手一样，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才能赢得胜利。

必须开展全面经济改革，使这些阿拉伯经济体从遵循“寻租”发展模式（企业的目标是通过政府赋予的特权或垄断权取得发展）转向以创造经济价值和就业机会为指导原则的发展模式。不过，这种转型过程中既有赢家，也有输家，其中很多都有政治上的相互关联。此类既得利益者将会反对改革。不过，在政治

剧变期间，在创建一种新秩序的同时，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可能随之减小——从而打开新的改革之窗。

显而易见，各国决策者应负责制定其改革议程。但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提供融资、政策建议和让市场更好地获得该地区的出口商品，来向这些国家提供帮助。目前，国际社会已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除了来自双边出资方（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大量捐赠外，国际金融机构自阿拉伯国家开始转型以来已承诺提供185亿美元的援助，这还不包括IMF为支持约旦、摩洛哥和也门的本国经济计划所承诺提供的80多亿美元援助。同时，IMF还参与了向埃及和突尼斯提供资金支持的讨论。这些国家当然需要更多的资金援助，除此以外，更多的贸易机会和更好的技术性政策建议同样至关重要。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远远超出IMF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开发机构、其他国际和地区性金融机构以及双边合作伙伴也正为此作出贡献，并且今后还必须继续如此。

结构性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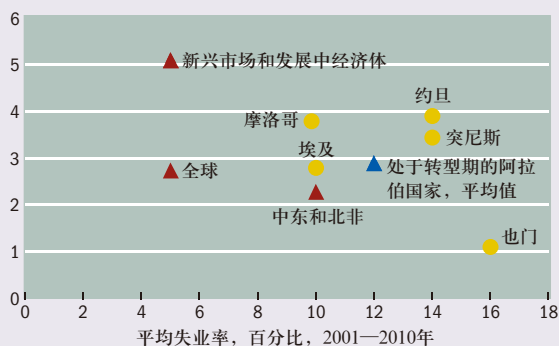
长期以来，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缺乏活力，失业率高，并且尽管推行了改革，但人均经济增长率无法达到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水平（见图1）。该地区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其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度也是世界上最为缓慢的地区之一。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已转向私有部门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但在政府部

图1
严峻的就业形势

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的失业率更高，人均GDP增长率更低。

（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率，2001—2010年）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LABORSTA数据库。



门的工作岗位仍比其他地区重要得多。很多阿拉伯国家缺乏经济活力，而这种经济活力曾带动了其他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转型。

要释放该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很多因素可以发挥作用。当然，不同国家之间的改革方案各不相同。不过，仍有部分优先领域是相同的（见IMF，2012年）。

增强该地区内部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贸易一体化，不仅对于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还将推动其他重大改革的进程。必须开展商业管制和政府改革，确保对各个企业的精简、透明和公平对待，最终提高公共机构的透明度和责任感。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改革将确保针对工作者开展充分的技能培养并保护其利益。改善融资的可获取性，有助于激发创业和私人投资。此外，公共财政的改革有助于释放资源并将其用于高度优先的支出项目，降低其脆弱性，这同样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

促进贸易的发展

近几十年间，贸易并未成为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重要的增长引擎（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图表释义”）。相比而言，该地区的出口量比其他经济体小，并主要面向欧洲。这使该地区无法从很多新兴市场，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的高增长中受益。同时，该地区在出口更多高附加值产品方面的进展仍然有限。

增强贸易一体化，可以显著推动该地区各个经济体的发展，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帮助维持开展全面改革的动力。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还将有助于

提供自律力和激励因素，开展旨在增强竞争力的其他改革。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来说，贸易一体化首先要要求这些国家能够获得进入发达经济体市场的更好途

增强贸易一体化，可以显著推动该地区各个经济体的发展，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径。例如，高关税、配额限制以及农业补贴仍是这些国家对欧盟农产品出口的重大阻碍因素。目前，这些国家与欧盟签署的协议并不允许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为从与全球贸易的一体化中充分受益，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必须继续解除其自身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针对增长迅速的新兴市场开展多元化贸易。通过解除非关税壁垒和保持各种政策的协调一致来加强地区一体化进程，还有助于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更好地与全球供应链进行接轨。

简化营商环境

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面临众多遗留的复杂繁琐的商业法规（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不同以往”）。例如，埃及拥有的对私营部门存在影响且往往相互重叠的法规多达3.6万个。因此，在这些国家创办和经营一家企业通常是一个极其漫长、代价昂贵和错综复杂的过程。

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政府治理排行榜上排名靠后，在过去10年间尤其如此（见图2）。其中，腐败是一个主要问题：中东和北非地区一半以上的企业称，有政府官员向他们索要贿赂，该比例大大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地区（《世界银行企业调查》）。

尽管很多国家已开始采取行动，但要改善商业管制和政府治理环境，这些国家还必须继续加大实施力度。要取得长期的成功，必须建立一个分权制衡体系，使国家和地区的关键机制不会受到政府过度自由裁量权和不透明干预措施的影响。例如，东亚地区的经验表明，那些在建立负责的、基于规则的机制方面富有成效的



利比亚的黎波里，一名妇女正在投票。



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常常大大超过那些其机制仍受制于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随意干预的国家（世界银行，2009年）。

尽管各个国家的改革需求存在不同，但商业管制改革战略的主要目的均应是消除在企业创办或关闭过程中的阻碍因素。应基于明确透明的规则，重新审查对企业注册登记的要求。此前的部门审批权赋予政府官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自主决定同意或拒绝批准哪个投资者。同样，应降低对最低资本的过高要求，放宽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除非有特殊的管制要求。此外，改革措施应主要关注于消除在企业退出方面的困难，引入现代的企业破产法规，对企业破产实行合法化。

就业和教育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面临严重问题。随着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高失业率和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年轻人的失业率很高，埃及、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年轻人失业率介于18%—30%之间，同时女性在求职方面也面临各种特殊的问题（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但求公平”）。

尽管各国之间在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方面存在差异，但仍有一些共同的因素。比如，劳动法规影响了企业雇佣员工的积极性，使得很多求职者转向非正规部门，这些工作者无法获得与正规部门就业者同等水平的保障（见图3）。而政府部门招聘中的（明确和隐性的）就业保障以及由于公务员报酬的相对丰厚而出

现不合理的薪水预期，导致了市场的分化以及人们对公共部门工作的过度需求。由于现有的教育体制主要侧重于培养学生为进入政府行政部门所需具备的素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往往缺乏当今就业市场所需要的那些技能。

尽管不同国家之间应对这些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同，但这些解决方案应总体针对以下五个领域，即重新评估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措施，在充分维护工作者利益的同时，减少对企业雇佣人员方面的不利因素；修改公共部门的招聘方式和薪酬政策，削弱公共部门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主导作用和影响；改革教育体制，使之更好地与私营雇主的需求保持一致；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更快地降低失业率；重点实施那些促进年轻人和妇女就业的政策。

钱来自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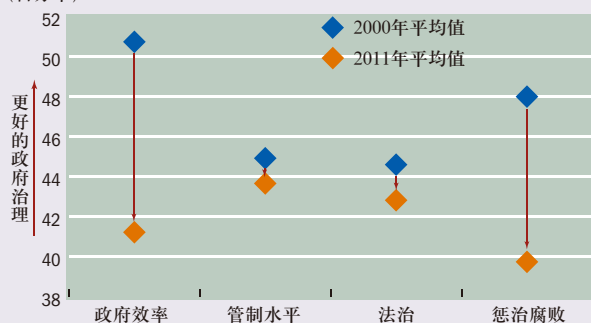
融资渠道是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制约因素（见本期《金融与发展》，“金融方面的思考”）。众多著名的大型企业从私人信贷中获益颇丰，而在某些情况下，由于需要为政府预算赤字融资而将私营部门的信贷排挤在外。在中东和北非(MENA)地区，仅有10%的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获得资金——是迄今为止全球所有地区中比例最低的——该地区36%的企业认为融资渠道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一比例仅仅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世界银行企业调

图2

肃清贪污

政府治理和腐败问题日益成为严重阻碍处于转型期阿拉伯国家发展的因素。

(百分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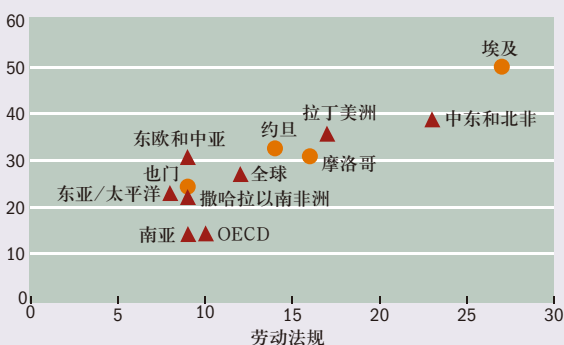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

图3

听取各方意见，建立规则

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的劳动法规过多，劳动力市场与教育严重脱节，成为严重制约企业活动的因素。

(受教育程度不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企业调查》，2006—2011年。

注：该图显示的是那些将受教育程度不足和劳动法规更多视为主要制约因素的企业所占的百分比。OECD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查》)。特别是，那些没有机会获得银行信贷的小型企业在必须依赖于它们所能找到的各种有限的替代方案，来实施其投资计划。

由于融资渠道有限而丧失的机遇会造成巨大的代价。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估算，将 MENA 地区的资金获取水平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可以使该地区的人均 GDP 增长率提高 0.3—0.9 个百分点。

因此，拓展融资渠道是那些寻求更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决策者应优先考虑的事项。对于处在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来说，由于其各自的起点不同，它们在改善融资渠道方面的战略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必须都侧重于建立或加强可以替代银行信贷的其他渠道，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加强整个金融行业的竞争。

税收时代

自 2011 年以来，工资和补贴的发放推高了处于转型期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支出。在社会压力和国际进口价格上涨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工资和补贴水平双双大幅上涨。政府支出的增加，部分是以资本支出的减

少为代价换取的，而这一点不利于这些国家的中期增长。政府支出的增长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和债务的增加，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更加脆弱（见图 4）。

据 IMF 估算，在 MENA 地区，那些没有针对性的补贴预算目前在其 GDP 中所占的比例接近 8%。普惠性补贴是一种无效的社会保障手段：仅有大约 20%—35% 的补贴支出提供给了 40% 的最低收入群体。相反，在一个设计良好的、根据收入调查结果而确定的现金转移支付体系中，通常 50%—75% 的此类支出可提供给 40% 的最低收入群体。如果此类现金转移支付体系证明难以实施，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物价补贴，应该是第二选择。

由于各国的起点和侧重点不同，各国在国家税收改革方面也将存在差异。包括埃及、约旦和也门在内的部分国家有能力通过征收直接税，如对收入、利润和资本收益征税来提高税收收入。目前，这些国家的直接税税率普遍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很多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可以通过仅对生活必需品免税以及增强纳税的合规性，提高其增值税收入。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埃及），可以将其标准税



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的学生在学校前的街道上载歌载舞，庆祝考试结束。



率提升至接近国际平均水平。无论选择何种手段，其最终目标都应是建立一个广泛税收体系，公平地产生必要的财政收入，同时不会阻碍经济活动的发展。

为穷人提供保障

政府支出和收入方面的改革，将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优先领域的支出提供资金，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使之更具包容性。部分财政节约措施还将降低财政赤字，减少高额债务（该地区的一个宏观经济脆弱性关键指标），促进经济增长。

一方面，普惠性物价补贴在该地区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为该地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保障的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网络还很不发达。财政预算压力使得改革普惠性补贴愈加迫切。与此同时，建立针对贫困人群的更好和更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络也同样迫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必须有一段技术性的筹备期。但在其他地区，通过借助现有的初期计划，可以立即作出改进。

正确把握政治形势

毫无疑问，实施一个全面的经济改革议程将面临很大困难，而妥善掌控政治经济局面至关重要。决策者的成功与否，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取决于在制定政策议程时能否认真倾听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包括那些在此前的政权中其意见不被关注的利益相关方。

其中一个成功要素是，了解谁将在改革中注定失利——无论是在特定地区、经济部门，还是不同人群

或收入群体之中。了解这一点，有助于预测出谁会反对拟定的改革方案。在次优的情景下，可能必须推进那些赢得足够支持的改革，而推迟其他方面的改革：毕竟，有进步总比没进步好。

与此同时，建立针对贫困人群的更好和更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络也同样迫切。

改革方案必须制定明确和可衡量的绩效目标。否则，各国政府就可能陷入“纸上谈兵”的风险之中。

有效的传播对于变革的成功至关重要。特别在当今的电子传播和社交网络时代，有效的传播必须成为整个规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人们要支持作出艰难的变革，必须首先了解作出艰难决策背后的论证过程。例如，在改革补贴政策时，决策者应向人们解释现有的补贴机制是如何的代价高昂和无效以及这些补贴给预算其他部分带来的影响。在实施提高税收或削减支出的改革时，决策者必须向人们阐明这些增加的收入正在产生好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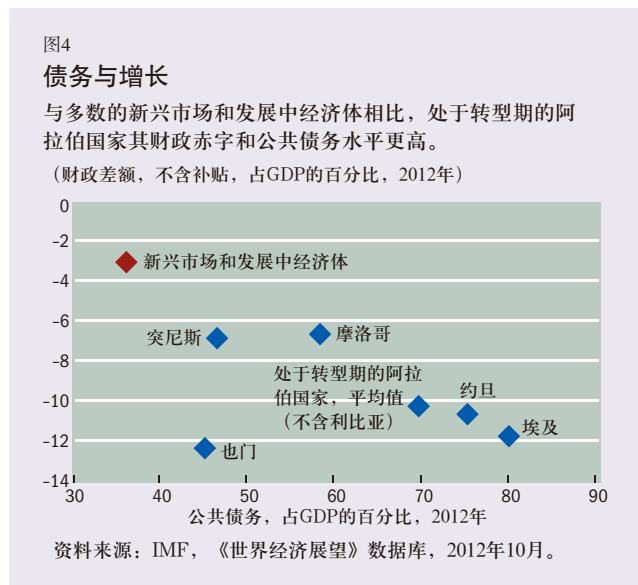
给变革一个机会

各国的决策者必须听取本国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同时借鉴国际经验教训，并借助相关国际机构的专业知识，制定一个明确的经济转型议程。各国的具体议程可能存在差异，但针对一些共同的问题所采取的主要行动仍是一致的。所有国家都迫切需要着手启动这一进程，制定一个共同的国家目标，指导各国如何调整其经济发展框架，消除目前犹豫不决的投资者对未来商业参与规则的疑虑，从而加快成果的实现进程，为促进各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赢得民众长期的支持。■

马苏德·艾哈迈德（Masood Ahmed）是IMF中东和中亚部主任。

参考文献：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2,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November).
- 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s (Washington, various years).
- , 2009, From Privilege to Competition—Unlocking Private-Led Growth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 ,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ashington).





埃及开罗艾因·夏姆斯大学的青年学生在一堂研讨课上争相提问。

自由与面包 可以兼得

马尔旺·马沙尔

阿拉伯世界
的经济改革
必须与政治
变革同步
实施

在阿拉伯国家面临严峻经济挑战之时，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事实，即不久前，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基本类似，或者更糟。如果该地区要成功地应对失业问题、鼓励外商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该地区的各国领导人就必须从最近发生的事情中汲取教训。

这些教训可以提供五项成功法则：经济改革无法单独取得成功，必须与政治转型同步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受益，并得到每个人的支持赞同；经济改革应基于一个明确的目标，可以得到量化；最后，经济改革方案必须得到有效的传播。

并非新的问题

对处于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来说，这次并非是它们首次面临如此重大的经济考验，也不是首次开展如此重大的经济改革。

例如，埃及和约旦早在 20 年前就应对过类似的经济危机，在某些方面，当时的状况比现在还要糟糕。20 世纪 80 年代末，埃及的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例接近 20%，通胀率同样高达 20%——均为当今的一倍。当时，埃及的债务占 GDP 之比为 76.5%，与当今 76.4% 的比值基本相同。而约旦的债务占 GDP 之比则达到



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133%，远远超出了当今 65% 的估计值。在 2011 年和 2012 年，上述两国的外汇储备大幅下降，而约旦在 1988 年的外汇储备几乎为零。

在过去 20 年间，埃及和约旦实施了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与 IMF 签署了协议，并对很多国有行业进行了私有化。埃及于 1995 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约旦在 1999 年成为 WTO 成员国，并在 2000 年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均与欧盟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

因此，在 2000—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埃及和约旦得以实现了持续健康的经济增长。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两国的普通民众仍然感到不满，这种缺乏制衡的管理机制使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同时他们认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未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么，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先有面包，再谈自由”

直至 2011 年暴动开始前，阿拉伯各国领导人还一直主张经济改革必须先于政治改革，即所谓的“先有面包，再谈自由”的改革方法。他们认为，如果在满足民众基本需求之前引入政治改革是一件为时过早，甚至危险的事情。只有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作出负责任的政治决定。然而，这一战略即便本着真心诚意的目的来实施，也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一方面，这种改革方法确实维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有助于保护贫困人群（在低增长通胀环境下，首先受到影响的群体）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这种改革方法并未带来包容性增长，也未处理腐败问题，导致腐败现象在没有同步开展政治改革的情况下成倍增加。

经济自由化不仅包括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同时也包括加强投资法律的自由化和与全球经济更紧密的接轨。不过，经济自由化常常无法实现政治或经济改革的目标。由于必要的经济改革措施并未同时建立一个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一些关键经济主体滥用特权的行为并未得到遏制和惩罚。

因此，很多经济改革计划仅仅使少数精英，而非平民大众受益。改革带来的利益集中在少数群体中，进一步削弱了改革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如果缺乏强有力的、能够履行适宜监管职能的议会机构，很多国有行业的私有化过程常常不具有充分的透明度，导致人们认为其中存在腐败现象，而这种看法往往是有依据的。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可以合理处理申诉的独立司法制度，很难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新闻体制或强有力的议会制度，也很难抑制腐败现象的发生，而腐败往往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显示，2003—2012 年，在

178 个国家中约旦的排名从第 37 位跌至第 58 位。而在 2003—2010 年（埃及革命前）期间，埃及的排名从第 70 位降至第 98 位。

尽管中东地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反对者的需求大不相同，但所有的反对者都希望惩治腐败。该地区的暴动除了要求对个别腐败分子进行惩处外，还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反对者认为，只要政治改革消除行政部门在权力分配中的主导地位，重新将权力部分分配给立法和司法部门，就可以实现适宜的监管。

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变革同步实施。经济改革必须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受益，并得到每个人的支持赞同。

埃及和约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很多精英人士认为，那些强有力的、有代表性的议会并不懂经济改革，并将议会视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而非合作伙伴。埃及、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制定的选举法的目的在于建立体制脆弱的议会，这些议会依赖和从属于行政部门，不能对行政部门的政策——包括对过去 20 年间的经济政策和做法——提出质疑。

普通民众习惯于依靠政府帮助解决其部分基本生活需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立法机构，可以针对政府出售国有资产、撤销补贴或维持部分人士认为对当地产业有害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决定进行辩论。真正的辩论可以展示出此类决定的透明度和负责任性，让普通民众确信他们必将从中受益。

不过显而易见，过去的经济改革——无论其设计如何好或者如何重要——均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这些经济改革孤立开展，未能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各国政府常常认为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必要，同时还将对经济自由化不利，他们担心在强有力的议会机构的影响下，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可能受阻。

基于市场的经济政策方案往往关注于经济增长，但忽略政治改革，同时不能改善普通民众命运，这些经济改革方案无法解决阿拉伯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过去 20 年间，该地区的贫富差距加大，特别是过去几年间粮食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在以商品（包括粮食和能源）进口为主的中东和北非国家，这种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状况最为明显。

基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在中东地区的失败，就是因为忽视了政治改革导致的。过去的政

策未必是错的，但并不充分。这些政策忽视了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如果这些过去的政策不能适用于当今新的现实情况，那么今后这些国家应该如何推进经济改革呢？

五大法则

阿拉伯国家的未来经济改革必须遵循以下新的法则。

法则 1：经济改革如不能与政治改革同步开展，则将无法奏效

针对经济问题仅仅给出经济解决方案是不够的。

1988年，约旦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第纳尔（约旦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几乎一夜间暴跌了50%。现已故的侯赛因国王在当时面临巨大的政府赤字和少得可怜的外汇储备。他给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政治层面的：他呼吁开展包容性选举，选举产生了约旦30多年间的首个有代表性的议会。这一解决方案产生了应有的效果。

约旦不仅成功地渡过了经济危机，并且其新成立的议会（尽管遭到了伊斯兰教徒的强烈反对）批准了IMF支持的一项计划和部分自由化措施，提高了约旦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增长率。第一次海湾战争对约旦造成了严重打击，在约旦反对外国势力进入该地区后，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终止了对约旦的所有援助。不过，约旦街头并未出现抗议：人们觉得议会倾听了自己的意见。人们与这一进程利害攸关。

然而，该地区的很多国家，包括约旦在内，很快忘记了这一历史教训。几年之后，约旦与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导致约旦作出了推迟政治改革的决定。过去20年间，该地区很多国家的政治改革完全停止，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目前，这些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状况相似（特别是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继续存在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它们不能仅仅依靠采取强硬的经济措施，如取消或重新分配补贴，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普通民众也不会再容忍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行政部门作出使其本已困难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单边决策。

目前，阿拉伯国家的选民希望其国家的经济政策能包括与受经济政策影响的民众进行磋商的过程，同时希望一个强有力的、负责任的民选议会能够对这些经济政策开展紧密的监督。

埃及在推翻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后的两届过渡政府均未能与IMF签署获得急需贷款的协议，其真正的原因是这两届政府均不是民选产生的，他们对公众的反应感到恐惧。相反，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成功当选埃及总统后组建的新政府正在与IMF协商一项新的融资安排。此前，埃及一直对IMF持怀疑态度。

IMF本身也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自“阿拉伯觉醒”以来，IMF与该地区各国达成的融资安排重点关注那些得到该地区经民选产生的新政府重大支持的本国计划。这些融资安排主张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补贴、改革补贴计划，并强调建立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络、创造就业以及增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改善政府治理的重要性。

成功地应对各国的经济问题，并且向其选民证明民选政府可以为该国带来更大程度的繁荣，这一点与所有的民选政府休戚相关。也就是说，当权派或者政治精英不能将对伊斯兰教的担忧作为借口，阻碍为支持经济改革所必需的政治改革进程。从经济层面上讲，伊斯兰教徒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例如，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尽管缺乏经验，但引入了一项决不会让非伊斯兰教徒或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经济计划。自由与正义党的经济计划明确了私有财产的重要性以及私营部门的作用，认识到在伊斯兰法律框架下强调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以及吸引国内外投资的必要性。中东各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彰显了由民选政府作出艰难经济决策的必要性，并可能由此推动政治改革。

法则 2：经济增长政策必须更具包容性

新任各国领导人必须防止经济增长仅使少数精英从中受益，并防止经济改革仅代表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及其他国家发生革命后，公众对立即改善生活状况（创造就业、提高工资和促进社会公正）的需求，要求该地区必须采取新的经济发展道路。

该地区过去的经济改革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并未惠及普通民众。这些经济改革不但未能缩小贫富差距，相反往往加大了这种差距。因此，今后的经济改革必须拥有一个很强的社会要素，使贫困人口能够改善其生活水平。补贴必须针对那些最需要补贴的贫困人口。同时，各国政府必须为改善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医疗和教育服务水平提供重大投资。

法则 3：经济改革计划必须由全社会参与编制

过去，阿拉伯世界的改革进程往往有名无实，主要是由各个政权制定的（通常没有与公众进行磋商），毫无疑问也是由政府或官僚机构执行的。这些由各国政权主导的改革进程往往不充分、具有临时性，而且对外沟通不够。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即便最好的方案也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

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项目有时带来急剧的经济变革和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比如突尼斯和埃及就是如此。但是，这些改革并不能改变这些政权的专制独裁特征。同时，这些改革缺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明确战略，由此形成的经济利益主要惠及与政权有关的商业精英。这一切并未逃过公众的眼睛，在该地区的很多国家中，人们对此类政策带有很深的敌视和怀疑情绪。

其他改革项目则是社会动荡的产物，所包含的政策改

革数量有限。《巴林国家行动宪章》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该宪章是应公众的变革需求而制定的，作为一个王室计划，该宪章的制定和实施没有与各社会和政治主体进行广泛磋商。2001年通过的改革方案包括建立两大议会（一个直接任命的议会和一个民选产生的议会）以及逐步使巴林转向一个世袭的君主立宪政体。尽管这些改革计划目标雄心勃勃，但均未能如愿——民选产生的议会无法真正履行其立法权，而王国也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巴林普通民众对政府仍然感到失望，并继续要求变革。

成功地应对各国的经济问题，并且向其选民证明民选政府可以为该国带来更大程度的繁荣，这一点与所有的民选政府休戚相关。

由那些需要进行改革的领导人来制定和实施改革项目，表明改革计划必须充分代表所有社会主体的利益，并让他们参与其中。如果改革计划不能考虑到受影响群体的意见，这些计划要么无法取得成功，要么无法被视为具有实质性的效果，要么无法被民众相信和接受。当埃及的军事领导人在穆巴拉克倒台后试图通过强制命令确立政治游戏规则时，便立即遭到了公众的反对。在新的中东地区，各种政治派别的阿拉伯民众的意识已经觉醒，并致力于改变游戏规则。在适宜的政治体制得到建立的同时，民众发现他们的意见正得到倾听。

法则4：经济改革计划必须可衡量，并指向一个最终目标

过去，改革进程往往过于重视承诺而忽视承诺的履行。制定一系列明确、透明和可衡量的目标，将确保各国政府开展实质性的改革，不至于转而再使用那些毫无意义的浮夸之词。

2004年在突尼斯召开的一次高层峰会上，阿拉伯各国的领导人通过了一份改革文件，该文件重申他们将致力于“扩大政治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维护所有公民的公平公正权利；尊重人权和言论自由；确保司法体系的独立性；提高女性在阿拉伯社会中的地位；认可公民社会的作用；对教育体制进行现代化改造”。

多年以后，这些承诺绝大部分仍未兑现。由于缺乏监测和跟踪这些目标实施进度的评估机制，上述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尽管约旦的“国家议程”简要描述了其最终的目标以及重大事件、绩效指标和时间表，但从未得到实施，而该地区也没有具有可比性的类似尝试。那些没有任何成果、夸夸其谈的所谓改革不再令人信服。

经济改革计划还应阐明其目标，如在10年间预算达到平衡，或为所有民众提供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如果民众清楚地了解其目标，就愿意作出短期的牺牲。中东地区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只是以危机模式在运行：民众只是被要求为政府超额的行政支出无休

止地买单，却看不到任何回报。例如，约旦民众近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在国际燃油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取消了燃油补贴。民众必须真正介入改革进程。即便变革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政策的设计应在改革初期产生部分效益，并让民众参与到实现明确的国家目标进程中的每个阶段。

法则5：必须让传播成为一个关键的政策工具

我们决不能忘记有效的现代传播方式所发挥的作用；传播必须成为整个规划过程，包括阿拉伯经济改革政策规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改革计划不能在政府内部达成一致意见后才开始向公众进行传播。必须在与议会和民间社会进行磋商的基础上编制改革计划，政府领导人必须在这一过程的每个步骤中向公众清楚地传达改革的目标。如果对这些计划秘而不宣，就像中东地区以往的做法，那么只会加剧公众长期以来的怀疑情绪，导致公众对政府的完全敌视态度。尽管实施起来可能很难，但若有望赢得公众的支持，就必须让传播成为一个关键的政策工具并在改革伊始就开始使用。

唯有变革

中东地区的经济改革进程可以产生应有的效果，但若沿袭过去20年间的发展模式，就将以失败告终。经济改革计划要取得成功，还必须包括政治要素。这些改革计划必须是可衡量、全面和具有包容性的，并在民间社会的参与下确定为公共计划的一部分。改革计划不能靠上层领导人强制推行；相反，必须获得民选政府的同意。最后，这些计划必须建立在人们对计划各个层面之间相互关系良好认识的基础上。要制定和实施一个全面的方案，具有明确和可实现的目标，并可同时应对政治和经济多个层面的问题，这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阿拉伯觉醒”使民众要求从其政府那里争取更多的利益。如果不能实现该地区更多人口的繁荣，政治变革的进程就会暂时中止。与此同时，如果不能向关键的机构进行必要的赋能授权，经济变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些机构对于帮助建立更加有效和透明的经济发展进程必不可少。此外，要推动该地区向前发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必须同步开展，缺一不可。■

马尔旺·马沙尔（Marwan Muasher）是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项目研究中心副主席。



阿拉伯经济改革必须以
社会公正为根本出发点

但求公平

伊拉克苏莱曼尼亚城的临时工正在浇注混凝土。

纳达·纳什夫、扎菲利斯·察纳托斯

拉赫玛·里法特是来自埃及开罗的一位工会成员，她已经为社会公正抗争了数十年时间。“我第一次被捕是在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执政期间的1977年，当时我为反面包价格上涨而进行游行示威，”她如是说道。“我被拘留了6个月。”

自那以后，里法特遭到的逮捕次数已经多得数不清了，而最近一次则是在2011年1月25日举行的那场游行示威期间，正是这场游行示威才催生了埃及第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我们走向解放广场，以抗议所面临的失业和压迫，”她这样说道。

群体性抗议所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埃及独立工会联盟的建立，从而打破了国家60年来对工会活动的控制。自此以后，埃及成立了数十个更为独立的工会。

但是，对于里法特及其他活动家而言，这场革命尚未结束：最终的目标是确保工作者、雇主及民间团体参与决策流程。

“如若我们希望埃及成为一个所有埃及人的乐土，那么国家必须减少对工会的限制，同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逐步推进社会对话，”她说。“政治和经济必须相辅相成——这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普通老百姓

“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令人始料未及。民意调查显示，

阿拉伯国家政府当时正处于发展经济的正确轨道上，即使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成果乏善可陈——国家正集中精力贯彻“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暂缓”的原则。这些国家的政府正在推行人们期待已久的市场化改革——由突尼斯和埃及率先实施。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取得相对较快的发展。一些人甚至宣称“阿拉伯复兴”的到来。

但是，这样的描述忽略了对大多数人而言真正至关重要的东西：体面的工作、获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公平机会、对老年人生活的帮助和保障、政府问责制及对国家大事的参与权。这种描述掩盖了过去20年间经济政策的扭曲、社会保障机制的日益羸弱以及政府、工作者、雇主及其他社会部门之间制度性社会对话的缺失。相反，政府把重点放在了一套狭义的市场化指标上，如私有化比率、贸易开放度、债务与通货膨胀的缩减及外国直接投资。

然而，当决策者的确关注到应该受到重视的指标时，他们常常对其有所曲解。例如，决策者关注到较高的年轻人失业率，然而却忽视了如下事实，即该地区的成年人失业率位居全球之首。事实上，大量的青年工作者意味着人口特征方面的一个机遇期，如若对其恰当利用，可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该地区的教育质量一直很低，但是更加直接的原因是该地区产业的技术含量低，因此，其所持续需要的仅仅是受教育水平较低和拥有较低技能的工作者。



在社会保障机制持续弱化及社会对话缺失的过程中，一些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大多数阿拉伯民众无法享受到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好处。经济的发展没有使绝大多数人受益，也无法满足受教育水平日益提高的更多的阿拉伯民众的愿望。阿拉伯民众，无论老幼，都有一种与日俱增的疏离感和不安全感。

发展速度尚不尽如人意

20世纪80年代是该地区“失去的10年”，它见证了石油价格跌落所导致的地区性经济放缓。阿拉伯政府通过大量的改革实现了振兴，刺激停滞不前、甚至日趋下降的经济，提升人均GDP，减轻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促进生产率增长，并增强自身羸弱的竞争力。但是，上述措施威胁到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契约，正是该社会契约才将阿拉伯统治者与其民众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不成文的交易，即民众以牺牲政治自由为代价换取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获得公共服务及国家施舍的救济品。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该地区的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推行了力度各不相同的经济改革。他们实现了一些目标，例如减少债务和通货膨胀。从本世纪之交以来，阿拉伯经济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增长，2000年至2010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5%。这些增长率史无前例，尽管如此，与除拉丁美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地区相比，仍然显得颇为缓慢。

更加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阿拉伯地区不仅人均收入增长率最低，而且民众话语权及问责制的推行最差（见图1）。这就意味着，民众在决策的过程中毫无参与权。政府对经济改革的社会影响一无所知，而且对治理问责体制的需求熟视无睹。

私营部门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阿拉伯国家推行经济改革的中心是强化私营部门的作用。私有化，或者更为准确地说非国有化，与开放资本账户及通过削减开支而实施的财政整顿同步进行。贸易政策成功与否的衡量指标是“开放性”，而非其对可持续及包容性经济增长的促进性。与人们的期望大相径庭的是，重获生机的私营部门没有产生能够惠及中产阶级和贫苦民众的足够多的收益。

政府转而削减公共投资，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公共投资排挤了私人投资。但是，阿拉伯地区的总投资依然较低。而且，这些投资仅流向为某些少数机构产生快速收益的部门，如金融、贸易和房地产。外国直接投资的确有所攀升，但是升幅并不如其他地区可观。在全球化的经济中，最重要的并非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有多快，而是其发展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

成功的私有化需要科学合理的贸易、金融和外商投资政策，同时也需要透明度及足够发达的资本市场和与之相伴的制度改革。而在阿拉伯地区，这些要素基本上十分欠缺。国家在推行改革时没有考虑到公共服务转交给私有运营商之后对社会部门所产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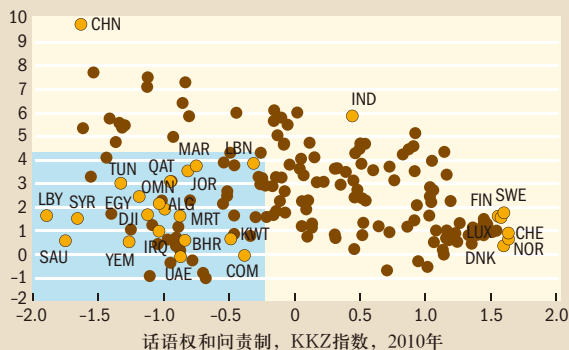
私营部门仍然受到重重限制。竞争受到遏制，因此，该地区本地行业竞争企业的数量最少，甚至位居非洲之后，同时，制造企业的年龄中位数也最大（高收入经济

图1

孱弱的话语权

阿拉伯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民众话语权及问责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百分比，人均GDP年增长率，2000—2011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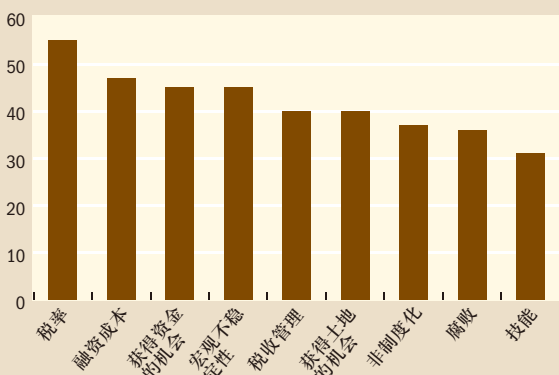
注：ALG=阿尔及利亚，CHE=瑞士，CHN=中国，COM=科摩罗，DJI=吉布提，DNK=丹麦，EGY=埃及，FIN=芬兰，IND=印度，IRQ=伊拉克，JOR=约旦，KWT=科威特，LBN=黎巴嫩，LBY=利比亚，LUX=卢森堡，MAR=摩洛哥，MRT=毛里塔尼亚，NOR=挪威，OMN=阿曼，QAT=卡塔尔，SAU=沙特阿拉伯，SWE=瑞典，SYR=叙利亚，TUN=突尼斯，UAE=阿联酋，YEM=也门。KKZ=《全球治理指标》中的考夫曼、克雷及索伊多-洛巴顿指数。

图2

重重牵绊

在中东地区投资面临多种严重限制性因素。

(在中东和北非国家投资面临某一既定限制因素的概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评估报告》。

体除外)。束缚投资者手脚的并非是低技能人口，而是税收、腐败及缺乏获得资金和土地的机会（见图2）。该地区的生产率仅小幅上升，而且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数量与质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就业岗位创造及人口特征的变化，阿拉伯地区失业率有所下降，年轻人的失业率尤为如此。在10多年前，随着该地区就业年龄人口数量停止增长，劳动力的增长开始下滑，即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劳动大军，也未能挽回这个局面。

但是，就业岗位仍然集中在诸如农业和服务业等低生产率部门及非正规经济之中。因此，阿拉伯地区是唯一一个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对生产率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的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业贫困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与其他地区相比，下降的速度颇为缓慢，而女性在低质量就业岗位中就业的比率仍然位居全球之首。更有甚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工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下降的速度更快（见图3），这表明，工作者在日益增大的蛋糕中所占的比例日益缩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与成年人的比例有所下降，北非和中东分别于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这一趋势。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中——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及阿联酋——年轻人与成年人的比例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入学率的上升促进了年轻人在劳动大军中比例的减少，同时提升了其就业能力。实际上，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年轻人失业率下降的幅度大于成年工作者失业率的降幅。因此，诸如“阿拉伯之春”是“太多年轻人失业”所导致的一般性解释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上，与“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相比，20世纪90年代期间年轻人的

人口数量更大，而且年轻人的失业率与成年人相比更高。再则，阿拉伯地区的高失业率很大程度上是由妇女的高失业率所致，尤其是年轻且受过教育的妇女。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失业率通常会下降，尽管如此，阿拉伯地区的失业率对属于各个收入群体的家庭均产生或多或少的均衡影响。受过良好教育的求职者失业率较高，而且，当他们就业之后，他们因其教育水平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即所谓的工资溢价）也较少。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教育质量较低或者技能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相匹配。然而，更有可能的一项原因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该地区入学率出现大幅攀升，对女性而言尤为如此，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相对于当地生产需求而言）的求职者供过于求。最后，该地区出现了最大规模的高技能工作者移民潮。阿拉伯求职者似乎能够满足更加发达的国外经济体的就业需求，但是却无法在国内找到体面的工作。

技能局限性是阿拉伯雇主最不关心的事项（图2）。因此，为员工提供培训的阿拉伯企业所占的比例位居全球最低。这支持了如下观点，即私营部门并不通过采取旨在提升生产率的措施来提高竞争力，而是通过敲骨吸髓的政治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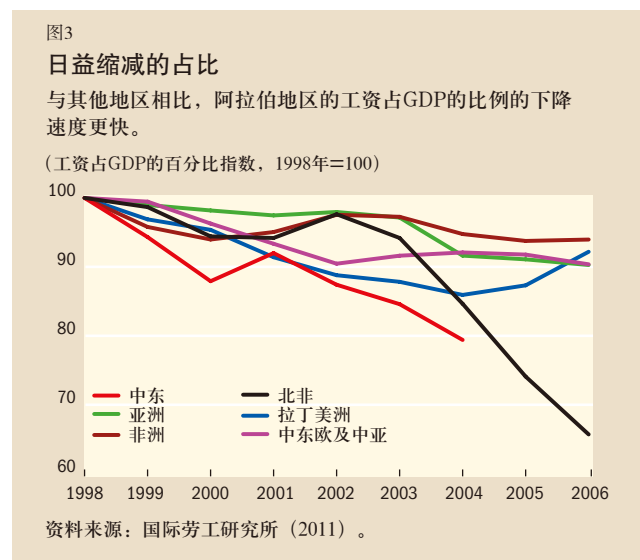
无助的穷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采取诸多措施，阿拉伯地区的贫困率没有出现增加的趋势，在一些地区甚至有所下降，尽管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速度较为缓慢。但是，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出现了下降（中东地区下降了21%，北非地区下降了34%；见图3），同时，人们开始觉察到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一切加剧了精英私有化所致的被排斥感。

在过去，社会保障机制通常通过公共部门的就业、各种不同的补贴及获得更多教育和医疗服务（尽管质量较低）的机会等形式来加以贯彻。此举无疑增加了政府预算，从而催生了旨在减少公共服务和减弱国家作为最终雇主的能力的经济改革。

许多改革合乎情理。例如，穷人没有从食品或能源统一补贴中获取太大利益，改革的益处主要通过正规部门就业率的增加而实现，尤其公共部门的就业率。但是，支出的削减太过突然，而且并没有通过采取有效且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措施来对其进行缓冲。私营部门趁机而入，致使排外的商业行为迅速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养老金改革的初衷与其说是为了给老年人提供保障，还不如说是为了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在2008年之前，政府仍未认识到毫无监管的金融市场的诸多弊端）。正规部门的雇主继续承担着产假福利的成本，此举使得企业不愿意招募女员工。这与全球范围施行的通过社会保障



机制来为产假福利提供基金以使所有妇女受益的趋势截然相反。而且在201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失业保险——属全球最低水平（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之外）。

努力创建新的社会契约

2010年，与本世纪之初的情况相比，阿拉伯民众对其未来更加悲观（见ILO和UNDP，图3.10，2013年）。尽管失业率有所下降，但是他们对未来抱有的期望却较低。他们在低质量、低报酬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挣扎艰难度日，几乎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参与社会对话的机会。

抑制劳动力市场状况转好和产出增长加快的，并非是年轻人的数量、年轻人的态度或其所受的教育，也并非不是劳动大军中女性人数的持续增加。真正的原因是，扭曲的经济改革未能给私营部门创建施展能力的舞台，抑制了生产率的提升，削弱了人们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并剥夺了大多数民众享受经济增长带来成果的机会。经济增长并非意味着无人失业，尽管如此，对于许多工作者而言，就业也并非能够带来优厚的报酬，加之社会对话的缺失，阻碍了旨在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共同努力，从而使民众日益产生不安全感和疏离感。

总之，市场化改革带来了一些积极成果，并展现了私营部门的巨大潜力。但是，改革未能实现其他地区最近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的经济增长率及财富创造速度。

在“阿拉伯之春”事件发生之后，阿拉伯国家必须积极稳妥地缓解普遍存在的不满并维持社会稳定。这正是这些国家必须与雇主、工作者及民间团体开展协商以出台更具针对性且更具一致性的政策的原因。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所存在的诸多局限性。

在未来数年内，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增长将继续维持在全球最低的水平，甚至低于2010年之前的水平，而且由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太慢，因而无法致使失业率降低。未来所要采取的政策必须避免以往所犯的错误：采用未经验证的理论、忽视措施落实所存在的局限性及施行缺乏清晰经济和社会标准的社会保障计划，同时，不加甄别地削减政府开支以及不把工作的重心集中到需求最迫切的方面。

何去何从

阿拉伯人需要一种基于社会公正的全新发展模式：一种依靠公平机会、生产率增长和体面工作而实现繁荣的模式；一种增强社会保障机制的模式；以及一种倡导社会对话的模式。市场化改革并不等同于对市场的听之任之，反之，在决定实施何种改革及如何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在这方面，政府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据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Silva、

Levin和Morgandi，2012年）显示，“在埃及、约旦、黎巴嫩和突尼斯，10个成年人中至少有8个表示他们国家的政府应当承担起为其国内穷人提供帮助的基本责任”。

必须对经济增长进行平衡，而且经济增长必须能够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并提供足够的社会服务，以确保男人和女人及其家人的生活有保障、有尊严。雇主

阿拉伯国家必须积极稳妥地缓解普遍存在的不满并维持社会稳定。

和个体经营者需要一片公平的竞争舞台，以从事合法的谋利活动，从微型和小型企业，到大规模的投资，不一而同，同时须摒弃只为既定的社会精英带来快速收益而将大多数民众排除在外的投资方式。未来的经济改革应当充分利用私营部门的巨大潜力。

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暂缓的办法并不再适合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政治和经济必须相辅相成。决策者应当强化社会保障机制，并提高其有效性，从而确保民众公平地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由设计周密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以及各个收入群体获得更多高质量教育和培训机会作为支撑。此外，该地区迫切需要建立及时而可靠的信息体制、更完善的统计数据追踪机制及有效的政策和计划监测和评估机制。

阿拉伯国家必须坚定地抛却社会与经济秩序相脱节的发展模式的残余影响，以实现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必须以促进社会的参与为原则制定一项全新的社会契约，以满足不愿退而求其次的数百万男男和女女的渴求，其中包括拉赫玛·里法特。■

纳达·纳什夫（Nada al-Nashif）是国际劳工组织阿拉伯国家地区办事处负责人。扎菲里斯·察纳托斯（Zafiriz Tzannatos）是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撰写的报告《经济增长再思索：创建更加高效、更为包容的阿拉伯社会》的作者，本文依据此报告撰写。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Labour Studies, 2011, *World of Work Report: Making Markets for Job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13, *Rethinking Economic Growth: Towards Productive and Inclusive Arab Societies* (Beirut).

Silva, Joana, Victoria Levin, and Matteo Morgandi, 2012, *Inclusion and Resilience: The Way Forward for Social Safety Ne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World Bank).

World Bank, *Investment Climate Assessment reports* (Washington, various years).

金融方面的思考

阿道夫·巴拉加斯、拉尔夫·恰米

在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阿拉伯之春”迎来了变革的曙光。人们的不满引发了示威以及后来的讨论。目前，在一些仍处于转型不同时期的国家，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显现。

然而，究竟是什么推动了阿拉伯世界的觉醒——要得出这一问题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非常明显的是，数十年来中东和北非地区经济增长的步伐和质量都落后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见图 1），并且没能处理好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这加剧了社会紧张。

尽管自 2000 年以来已经有所起色，但该地区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并且因此引发了政策制定者的重大关注。几项研究揭示了一些影响因素，包括制度质量欠佳，经商困难，政府支出水平高以及缺乏贸易开放性。

最近，金融部门成效有限被确定为另外一个阻碍长期增长的因素。通过总结大萧条后的金融现状和评估其在促进增长中的作用，当谈及促进金融发展时，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面临的挑战开始浮现。

摆脱繁荣萧条循环

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从 21 世纪前十年中期开始，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经历了明显的银行借贷加速。直到 2008 年，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在以极快的速度扩大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信贷扩张速度经常远远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最近的分析工作发现，在 2008 年前后的某个时点，八个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处于信贷繁荣期间，信贷占 GDP 的比率大幅超过了历史趋势（Barajas 等，2011 年）。与此同时，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连同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中欧和东欧地区，都正在经历普遍的信贷繁荣。

但是，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倒闭在全球引发了一



为了帮助推动经济增长，阿拉伯国家需要稳定的资金供应和更好的信贷获取渠道

黎巴嫩贝鲁特，一名男子从自动取款机中提取现金。

系列事件，接踵而来的资金枯竭——无论是国内资金还是国外资金——导致了信贷增长出现了同样惊人的下滑。例如，巴林的信贷增长在 2008 年年中达到超过 26% 的峰值之后，于 2010 年第一季度下降到了刚刚超过 4% 的水平。约旦的信贷增长暴跌：2008 年其信贷快速增长了 14%，而 2010 年第一季度则萎缩了 2%。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能观察到这种普遍的信贷增长变化模式，其中石油输出国和高收入水平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尤其明显。

最近，尽管信贷增长确实从危机后的低点有所回升，但仍然没有从繁荣萧条循环中彻底复苏。基于在该地区过去 25 年的繁荣萧条循环中所观察到的典型表现，上述研究表明，至少需要三年才能回升到正常的增长水平，即每年 5% 的范围内。事实上，在 2011 年



和2012年年初(这是对于不同国家的最新可观察数据),与2008年之前四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该地区危机后的平均信贷增长率大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最近12个

在1970年至2010年的这段时间里,大约有13%的时间该地区经历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全世界以及整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各自经历

尽管信贷增长确实从危机后的低点有所回升,但仍然没有从繁荣萧条循环中彻底复苏。

月的平均增长率接近4%(见图2)。部分因为2011年“阿拉伯之春”政治转型所导致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经济活动混乱,非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信贷增长更为乏力,增长率低于每年3%。

稳定的体系

与其他地区相比,中东和北非地区银行体系的一个显著积极方面是,其普遍不稳定的倾向较低。不仅最近的繁荣萧条循环是这样,而且从更长的期间来看也是如此。Laeven和Valencia(2012年)的研究把全世界的系统性银行业危机识别为包含以下现象的事件:广泛的银行挤兑、银行亏损或清算伴随大规模的危机干预措施。他们的分析显示,在过去的40年间,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发生上述事件的频率非常低。

的金融危机时间比例为22%—23%(见图3)。此外,2000年至2010年期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危机爆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此期间的某个时点超过60%的国家发生了危机——但是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设法完全避免了这些危机。我们注意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此期间通常都没能避免危机:经历危机的时间大约为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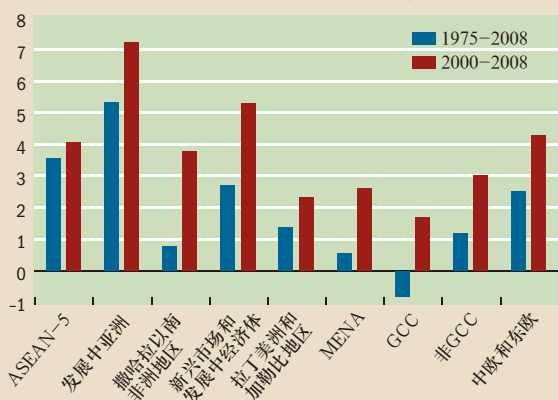
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尽管经历了上述繁荣萧条循环,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也经历了几十年的稳定时期,即使不明显,金融深化也增强了金融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结果,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2009年该地区表现得相当理想,尽管出现了一些从总量数据中还无法立即体现的问题(Barajas、Chami和Yousefi,2011年)。通过使用银行业和股票市场的标准化深度衡量尺度,即私人部门信贷与GDP的比率以及市场成交量或者交易值与GDP的比率,结果显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金融发展非常

图1
增长滞后

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平均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按地区划分,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作者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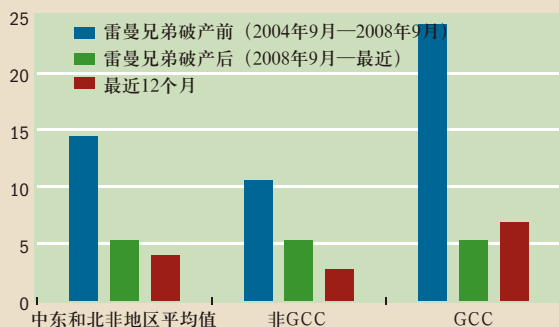
注:ASEAN-5:东南亚国家联盟-5,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MENA:中东和北非,包括阿尔及利亚、巴林王国、吉布提、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也门;GCC:海湾合作委员会,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

图2

信贷悬崖

雷曼兄弟破产后,该地区的信贷增长大幅下滑。

(实际信贷的平均年度增长率)



资料来源:IMF,《国际金融统计》;作者的计算。

注:为了能包含尽可能多国家的最新可获得数据,雷曼破产后时期的数据取几个不同时期的平均值。大约有一半国家的最新观察数据始于2012年6月或更晚。其余国家的最新观察数据始于2011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或者2012年年初。GCC:海湾合作委员会(见图1)。

充分，大大超越了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见图4）。

然而，第一个问题是，在总量数据下面隐藏着该地区各个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例如，在2009年，约旦私人部门信贷总量占GDP的比例为78%，几乎是利比亚观察到的水平的8倍。同样地，沙特阿拉伯的股票市场换手率为199%，大约是黎巴嫩的11倍。

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尽管中东和北非地区经济体创造的存款量非常大，但是以银行作为中介向私人部门提供的资金量并不大。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银行体系更倾向于把资金汇往国外，或者投资于本国的证券——例如政府债券——而不是把收到的额外存款用于增加信贷发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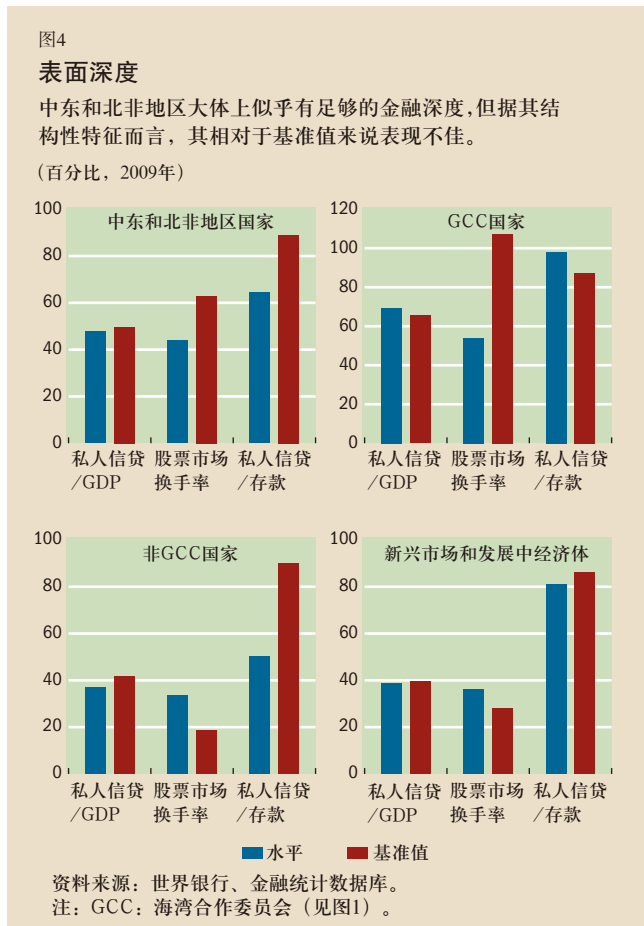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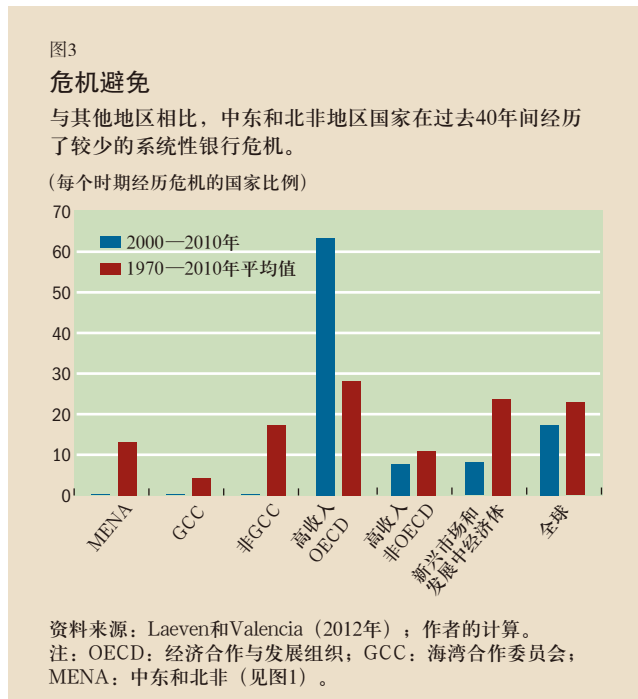
通过分析这些潜在问题和比较金融深度（不仅与其他地区对比，而且还涉及经济结构特点），我们可以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认识到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可部分地由一些结构性因素加以解释，比如其收入、人口规模和密度、年龄分布以及其是否是石油输出国或者离岸金融市场，世界银行制作了金融深度的基准，通过与基准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一个国家在不同时点上的金融发展水平（Al-Hussainy等，2011年）。简言之，该基准体现了在给定结构性特征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所应具备的金融深度。

这种对照增强了我们之前的讨论。截止到2009年——最近一年的结构性基准估计年度——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平均的信贷/GDP比率为48%，股票市场换手率为45%，两个指标均比整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高大约10个百分点（见图4，左上图和右下图）。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给定指标的平均水平应该等于平均结构性特征所预测的水平。然而，对于个体的国家或地区来讲，这一点并不必然成立，有可能低于或超过它们的基准值。尽管大体上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银行体系中私人部门信贷量大致可以从其结构性特征中预测得出——信贷与GDP以及信贷与存款的实际比率大致等于各自的基准值——但中东和北非地区银行体系的表现却低于基准值。

这种低于基准值的现象在非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和信贷/存款比率方面最为显著，信贷/存款比率低于基准值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存款资金转化为私人部门贷款的能力很低。事实上，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信贷/存款比率低于其结构性基准值18个百分点，而在非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这一比率低40个百分点（见图4，左上和左下图）。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大规模的公共部门借款，特别是在某些非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例如，在阿尔及利亚，银行借给公共部门的资金要比借给私人部门的高50%，叙利亚高20%，埃及的则大致相等。大体来看，中东和北非地区银行体系借给政府和国有



企业的资金量大约接近 GDP 的 13%。至于股票市场活动，该地区的换手率乍看起来似乎相对较高，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最高换手率水平也只达到其基准值的一半。

改善渠道

最后一个问题是该地区形成与其金融深化水平相称的融资渠道的能力，世界银行（2011 年）强调过这一点。尽管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在改革商业环境和深化金融市场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该地区存款和银行贷款渠道的排名除了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仍然低于其他所有地区。此外，可得信贷趋向于严重集中，银行支持少数大型成熟企业，而小型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创造了大多数的就业岗位——仅能依靠有限的内部融资或者非正规渠道来获得急需的资金。

此外，不仅相对于其他地区，而且相对于信贷深度，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的信贷渠道都非常缺乏。例如，几乎无一例外，该地区的人们对银行贷款的使用都低于拥有相近私人部门信贷/GDP 比率的其他国家（见图 5）。

IMF 先前的研究发现，对于一个给定的银行业深度水平，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都要低于其他地区——这表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银行体系存在质量差距。

深度还不够

中东和北非地区正处于一个历史关头。除了政治

转型挑战，经济目标非常明确：提高经济增长率，创造工作岗位以及确保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非常明显，单单是金融稳定并不足以令该地区获得经济增长的益处，并且该地区迫切需要包容性的金融深化。要实现

不仅相对于其他地区，而且相对于信贷深度，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的信贷渠道都非常缺乏。

此目标，需要一个广泛的议程，该议程涵盖健全的经济政策以及影响深远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

在未来几年，一个成功的改革议程需要平衡推进。增加深度——在那些依然落后的国家——以及增强现有深度的获得渠道，将需要市场友好型政策组合来消除扭曲，例如进入壁垒、利率和信贷控制，银行的直接国有化以及为政府融资的巨大压力。另外，旨在改善金融中介环境的更广泛政策应致力于：必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必须加强保护债权人和小股东利益的法律保护以及必须增强信贷信息和抵押制度。当然，随着这些经济体信贷规模和范围的增加以及借款人群体扩大到关系良好的传统大型企业以外，信贷风险有可能会增加。政策制定者应该确保市场治理政策，无论是微观层次的还是宏观审慎层次的政策，都应胜任这项任务，从而使得更大规模的融资带来的收益不会被过度不稳定所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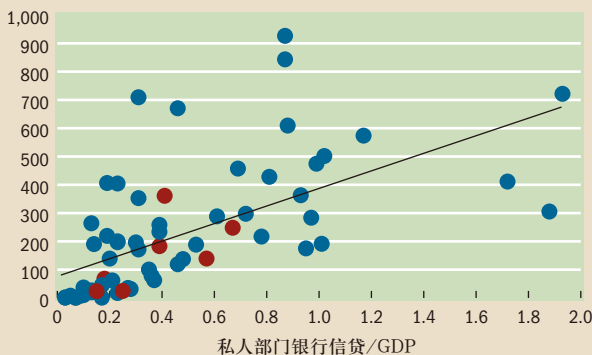
阿道尔夫·巴拉加斯（Adolfo Barajas）是 IMF 能力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拉尔夫·恰米（Ralph Chami）是 IMF 中东和中亚部处长。

图5

借款人困境

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在信贷量相同的情况下，这些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提供的商业银行和银行贷款渠道较少。

（每1000个成年人中银行借款人的数目，2008年）



资料来源：IMF，《获取金融服务状况调查》；世界银行；作者的计算。

注：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用红色标出。

参考文献：

Al-Hussainy, Ed, Andrea Coppola, Erik Feyen, Alain Ize, Katie Kibuuka, and Haocong Ren, 2011, "FinStats 2011: A Ready-to-Use Tool to Benchmark Financial Sectors Across Countries and Over Time" (Washington: World Bank).

Barajas, Adolfo, Ralph Chami, Raphael Espinoza, and Heiko Hesse, 2011, "Further Fallout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redit Crunch in the Periphery," World Economics, Vol. 12, No. 2, pp. 153-76.

Barajas, Adolfo, Ralph Chami, and Reza Yousefi, 2011,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hapter 3.3,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April).

Laeven, Luc, and Fabián Valencia, 2012, "Systemic Banking Crises Database: An Update," IMF Working Paper 12/16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Bank, 2011, MENA Financial Sector Flagship Report (Washington).

在新兴中产阶级的推动下，私营企业对中东地区顺利的民主过渡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同以



突尼斯马赫迪耶的一家基里姆毛毯店。

瓦里·纳萨尔

“阿拉伯之春”的起源地是突尼斯，而非叙利亚或也门，这并非事出偶然。

突尼斯之所以成为导火索，是因为那里的人们对繁荣和增长充满了期望，是因为该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是因为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持有相对自由的政治观点并渴望获得伴随经济繁荣而生的政治自由。

在政治稳定、经济活动开放的环境中，私营企业往往会蓬勃发展，经济也出现增长势头，从而为中产阶级的涌现提供支持。中产阶级的兴起又可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并促进民主进程。

如果中东地区意欲实现“阿拉伯之春”催生的民主希望——而且如果世界其他地区想要享受其所获得的全球化利益——该地区及该地区以外的国家必须培育私营企业，并催生一支庞大且能够畅所欲言的中产阶级队伍。

肥沃的土壤

当突尼斯于2011年1月爆发全国性游行示威之时，该国的经济十分开放且颇富生机。该国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且具有熟练的技术——20%的人口使用脸谱网与国内外的家人和朋友交流。

在发生“阿拉伯之春”事件之前的10年中，突尼斯被人羡慕地称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尽管该国实施独裁统治且备受腐败问题的困扰，但是，通过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该国还成功地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而且其经济发展速度可与那些大型的新兴经济体相媲美。快速的经济增长催生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最终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推动力。

阿拉伯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均遭受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国家对经济的管控导致大量臃肿的程序性公共部门



往



的产生，在政府保护和高关税壁垒的作用下，这些公共部门抑制了人们的创新和创业欲望，同时也对效率低下的部门提供了保护。

因此，阿拉伯世界落在了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后面。僵化的制度加剧了贫苦和人们心中的挫败感。该地区人口的“年轻人暴增”现象使该问题进一步恶化。

假如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如果阿拉伯世界未能效仿东欧、拉丁美洲及东南亚经济体实现成功过渡——则该地区的民主未来不仅将夭折，而且还将变得更加贫穷和不稳定。这将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而给全球安全 and 经济繁荣造成威胁。

最为明显的危险是挥之不去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幽灵，但是，手足相残的地区冲突、人道主义危机及面向欧洲的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也是令人担忧的威胁。

由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增长

如今，阿拉伯人口达到4亿，到2050年，将增加一倍至8亿。人口的增长使得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成为该地区一项迫在眉睫的目标。抛却上述目标不谈，即使停滞不前并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阿拉伯经济体也将需要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9%—10%的“虎体经济体”(tiger-economy)增长速度。这无疑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项单凭公共部门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经济增长必须源于私营部门，而此举需要对经济实施改革：取消监管、放松政府管控、促进贸易并强化法律法规。

毋庸置疑的是，该地区的私营部门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在过去的10年中，经济的开放——主要由突尼斯、埃及、阿联酋、约旦和摩洛哥实施——及由高油价所导致的新技术和资本的大量涌入促使中小型企业蓬勃发展。这些新生企业既涵盖了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又涵盖了新创建的行业，如新兴技术型企业。其中的一个范例便是雅虎于2009年8月以1.2亿多美元收购约旦创新网络公司Maktoob。

正是由于中小型企业积极从事此类经济活动，我们才能够无视该地区当今暗淡的局面，对切合实际的经济变革踌躇满志。迪拜、马来西亚及土耳其所实施的经济改革，诸如埃及、巴基斯坦及约旦河西岸等地区政府管控的稍许宽松，均为当地的商业和国际贸易拓展了空间，即使幅度仍显得捉襟见肘。当地的企业家和商人开始不失时机地对此类变革加以利用。

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私营部门经济活动持续增加的效果之一是催生了数量不多但持续增长的中产阶级队伍。20世纪60年代，在较大的穆斯林国家中，如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平均不到总人口的1/3，而且据估计，中产阶级最多仅为5%左右。而如今，这些国家约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中产阶级约占10%。

如若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界定中产阶级，将拥有正式工作、具有稳定薪水和福利且其1/3的收入可作为自由支配开支的人归入中产阶级，则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可分别约占其总人口的15%和30%。如若进一步拓展此种定义，将具有现代家庭生活价值观的人纳入其中，例如希望少生孩子并为其未来发展而不惜投资等，则这一数字甚至更大。据估算，多达60%的伊朗人已然或即将踏入中产阶级队伍。

中产阶级兴起的迹象及由此推动的资本主义浪潮在中东各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遭受革命席卷的开罗、饱受战争摧残的贝鲁特及备受制裁的德黑兰也屡见不鲜。尽管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看似前景黯淡，但在过去10年中，该地区多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开始出现振兴的迹象。此类经济活动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总体经济态势，但的确呈现了某种势头，并使人们看到变革的可能性。2002年至2008年期间，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实际GDP增长了3.7%，与此前10年相比增加了0.7个百分点。

中产阶级企业家是其所属国家状况改善的最大希

望，同时也是抗击极端主义、争取民主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数量有限的中产阶级所依赖的是国家发放的薪水和保障的权益，极少与自由市场建立联系。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以及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为当地企业家的日益增多提供了支持，此举可有助于改变上述情形。

这些力量已然产生了某种影响。2009年的伊朗大选骚乱便是日渐兴起的中产阶级抗争的结果，旨在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因为内贾德极力谋求强化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地位。如前所述，“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起源于中产阶级谋求政治变革的努力，以满足该群体对文化和经济方面所抱有的期望。正如土耳其凭借其中产阶级推动自身改革，成为一个成功的穆斯林民主国家并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一样，阿拉伯世界也同样可以利用新兴的中产阶级以及人们创业的热望来实现增长。

阿拉伯新兴中产阶级的前景颇具吸引力：通过增强中东地区的稳定，中产阶级还可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中东地区位于更大范围的穆斯林世界的中心，而这个穆斯林世界在改革面前正蓄势待发。随着15亿消费者的经济能力日渐提高，他们将要求获得自由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一些人将购买具有明显伊斯兰特征的商品：不仅仅是清真食品和头巾，而且包含伊斯兰银行服务、教育、娱乐、媒体和消费品。

伊斯兰金融业的振兴

消费者的此类需求已经在全球市场中掀起了波澜，从伊斯兰金融业（金融服务遵守禁止收取和支付利息的伊斯兰规则）的振兴可窥一斑。此类服务的增长正在使得中东地区更加紧密地与全球经济实现一体化。尽管伊斯兰金融业仍然是一个利基市场——伊斯兰债券市场（市值接近1,000亿美元，在全球债券市场中仅占0.1%）及超过75个国家中的约300家伊斯兰银行和投资公司所监管的银行业服务价值数千亿美元——然而一些人估计，到2015年，该行业的资产将增长至高达4万亿美元。

该新生中产阶级中的一些成员是旧官僚的子女，但是绝大部分成员均来自乡村和较低社会阶层。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子女利用现代经济体制一跃成为中产阶级。许多人对于他们的宗教十分虔诚，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及愿景使其与极端主义分子截然不同。毕竟，拥有财富的人能够更加洒脱自如地消费，他们往往具有自由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并且对世界事务兴趣盎然。

这并不是说中产阶级穆斯林恐怖分子将不复存在。但是，与20世纪90年代的拉丁美洲颇为相似的是，

恐怖主义将不再引起真正融入世界的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兴趣。那些在商业和贸易方面利益攸关的人将不会支持可危及自己未来的破坏性想法。许多穆斯林对西方世界产生的疏离感和愤怒是历史积怨的产物，但他们与全球经济的隔绝无疑大大加剧了这种疏离感和愤怒。如要改变这种局面，许多穆斯林必须向前看而不是抱住历史不放。这些“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的振兴是一项必然的趋势，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其蕴含的力量和所处地位的重要性绝不次于极端主义。而且，它无疑是彻底改变穆斯林世界思想观念的关键所在。

突尼斯或开罗的商人是否将掀起一场全面的革命，从而实现阿拉伯政治的民主化——类似于四个世纪之前荷兰新教主义者所发起的那场历史性变革，现在做如此的推测为时尚早。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由企业家推动的资本主义的稳步发展是真正实现中东现代化的途径之一。

西方利益

全世界正在饶有兴趣地关注“阿拉伯之春”取得的成功。假如这场变革没有将中东地区推向繁荣和民主的道路，则不断恶化的不稳定政局和肆虐的极端主义将对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冲击。

如今，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在不断蔓延，对其发挥遏制作用的将不是那些开明的牧师或自由主义改革者，而是企业家和商界领袖。这对西方政府而言具有十分明显的启示作用。当价值观服务于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时，可带来可观的收益，而当持有此等价值观的人获得权力时，这些价值观将塑造国家的行为。

在资本主义取得发展之后，欧洲民主的胜利便接踵而至。迄今为止，温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仍未被中东地区完全接受，这不仅因为伊斯兰宗教的根本性质所致，而且由于领导这一潮流的商业阶层仍然势单力薄。帮助这个资产阶级壮大队伍并在社会中取得主导地位是确保民主价值观生根发芽的最佳途径。

美国及其盟友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第一个解决方案是扩大与该地区的贸易。为了保护其在大中东地区的利益，西方已经牺牲了众多的生命并投入了大量的金钱，然而，西方国家与这个地区（土耳其除外）开展的实际商业活动微乎其微。除石油和武器销售之外，美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贸易额仅仅是与拉丁美洲、东欧或印度之间贸易额的一个零头。如今，美国与约旦和摩洛哥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而欧洲也正在考虑与地中海边缘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建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这些无疑是积极的措施，但在西方商场的货架上，阿拉伯世界制造的商品仍然乏善可陈。

西方政府似乎理解企业创办、商业和开放市场对阿拉伯世界未来的重要作用，但却根本没有促进经济变革的机制。官僚规则阻碍了中小企业的金融投资——美元仅仅投入到了非盈利的企业之中——而且缺乏协调一致的力量推动政府实施改革。对经济变革的讨论滞后于政治议题。

在一定程度上，鉴于其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成功，中小型企业仍然是该地区的希望之星，也是国际



阿拉伯新兴中产阶级的前景颇具吸引力：通过增强中东地区的稳定，中产阶级还可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社会对该地区经济愿景的希望所在。但是，这种愿景也基于如下信念，即该地区仍然拥有充足的资本——来源于当地的投资者，与西方投资者相比，他们在面对政治风险时要更加灵活自如。正是这些充足的资本才使得该地区保持了生机和活力。此外，人们还希望，执掌大权的新生代领袖们将会抱有亲商主义的态度。在最近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把自己塑造成为“埃及的埃尔多安”（系指深受人爱戴、利商的土耳其总理）。而备受人推崇的看法是，穆斯林兄弟会商人群体将会推动阿拉伯世界各地的政党采取商业主导经济增长的措施。

稳定与改革

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中小型企业可以做些事情——实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新生民主国家中奏效的一些做法。但是，这必须以两个根本性因素为前提：政治稳定和彻底的经济改革。

在该国恢复法治之前，很难想象投资者会回到埃及，而一旦街头骚乱结束，政府稳定便指日可待。但是，商业的振兴还需要获得如下保障，即劳动工人结束罢工，政府强制实施并守护劳动力市场规则以及政企关系处于稳定和可预测的状态。

阿拉伯世界可能拥有充足的资本，但如果工人罢工影响到经营，工资份额致使盈利减少，且商业的增长前景持续笼罩着不稳定的阴云，那么，这些资本不太可能投入到这些国家的企业之中。在重大变革席卷

该地区之后，可以预计的是，将会出现某些政治不稳定因素。尘埃落定、恢复秩序和稳定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但是，其中一些政治骚乱发生的原因是经济体弊端重重。

以埃及为例，在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后一年之内，埃及的经济萎缩了0.8%（以2011年为基准），制造业下降5.3%。失业率攀升至12%（年轻人失业率为25%）。国内私人投资下降了10.5%，外国投资跌至谷底——从2010年的64亿美元跌至2011年的5亿美元。2011年下半年，国内外投资的暴跌使政府出现了11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国外入境人数下降了约35%——对于一个旅游业占GDP11%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政府的预算赤字迅速增加至110亿美元（占GDP的10%，位居阿拉伯世界之首）。加上资本出逃——由于持续的政治不稳定，出逃有增无减——外汇储备急剧下滑，从430亿美元的高位跌至150亿美元。每五个埃及人中有两个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因此，此类事件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毫无疑问的是，为了解决这项挑战，需要实现经济稳定。这正是西方列强在2011年八国集团（G8）多维尔峰会上所作出的承诺。但是，稳定仅仅能够提供稍纵即逝的利益，还不足以完全逆转一直困扰该地区并加剧其治理和经济危机的趋势。

清晰的未来之路

经济改革和民主化需要私营部门的增长和商业的活力。中小型企业必须凭借足够强大的增长主导这一过程，以确保阿拉伯国家成为成功摆脱各种问题的新兴国家；只有到了那时，民主才有机会在该地区生存下去。而如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所有最近获得成功的民主化均与经济重组密不可分。国际金融机构与西方政府和私人捐助者携手合作，为彻底的改革提供资本，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种合作关系通过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得以最终确定。培育增长和民主的这项战略备受诟病，它并不总是能够奏效——或者效果十分完美——但是如若没有这项战略，大多数的民主努力均将功败垂成。

阿拉伯世界呼唤一个全新的“华盛顿共识”的诞生：实施改革、提供资金以促进改革的清晰战略。这是为企业增长营造恰如其分的环境和提供充足资本的最佳途径。■

瓦里·纳萨尔（Vali Nasr）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院长，也是即将出版的《可有可无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收缩》（Dispensable Nat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Retreat）一书的作者。

把握契机

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实现其社会急需的基础广泛的增长



大卫·利普顿
(David Lipton) 是IMF
第一副总裁。

“阿拉伯觉醒”——始于2010年12月突尼斯一个乡镇上的街头小贩自焚——继续主导着该地区的事件。接下来的一个月，埃及要求“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呼声回荡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改革的任务不仅仅在政治领域——而且深入延伸到经济领域。人们正在呼吁要求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享有发言权，并呼吁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机会。

两年之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未来仍不明朗。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紧迫挑战是满足人们的高度期望以及推行严厉的改革措施以控制公共财政和增强薄弱的金融体系。面对宪法和治理问题上的政治争吵以及关于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的争论，事实证明，进行经济改革非常困难。

一些人很阴暗地警告说，该地区的革命正走向失败。相反，我相信革命可能会走向以下三条路径的任何一条。我们可能会看到：

- 经济混乱的趋势，如果针对政治权力的争吵阻碍了稳定，更别提改革了；
- 在既得商业利益集团的一再主张下实现了稳定，这将会使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获得一定的喘息。但也会使该地区再次陷入经济停滞，或者最好也就是温和和经济增长；或者
- 呈现出新的经济形势，如果新当选的政府逐渐终结了经济混乱，并推行改革，为本国人民打开通往更多经济机会的大门。

毋庸置疑，前两条途径是不可取的，但第三条途径很难达到，世界经济的现状使得推行大规模改革更为不易。全球经济放缓，欧洲持续的不确定性，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以及叙利亚冲突造成的悲惨生命损失，所有这些都带来了风险，

使得该地区过去两年取得的脆弱收益受到损害。

对于试图完成艰难政治转型的领导人来说，同时追求稳定和变革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成功的前景如何？如果可以的话，国际社会能够做出哪些努力来对最终成果产生影响？

转型中的地区

中东和北非是一个多元化的地区，包含20个国家，人口超过4亿，GDP达到3万亿美元——大约占全球人口的6%和全球GDP的4%。各国环境差异很大。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而其他国家则必须同时进口能源和食品。然而，该地区最有利的经济统计数字是，该地区整体的非石油出口额为3,650亿美元，大约与比利时相同，而比利时只有1,100万人口，而不是4亿。该地区遭受着难于融入世界经济之苦。

在人们走向街头示威很早以前，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也门——面临着为快速增长的年轻人口提供工作的挑战。尽管推行了几轮改革，但这些国家的经济难以创造足够的工作岗位。存在三个相关问题。

第一，缺乏对主要出口市场的开放以及进入渠道。第二，在一些国家，反复增加对不满群体的能源和其他补贴，这使得预算捉襟见肘，难以对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第三，尽管进行了有意义的结构性改革尝试的地方，人们普遍认为，新兴部门的投资依然控制在精英阶层手里。

结果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失业率高



企，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为了实现全面持续增长，中东国家必须从政府主导投资过渡到私人投资，从行业保护过渡到出口导向型增长。简而言之，私人部门必须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

改革的关键领域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认为有四个主要领域需要进行改革。

1. 加强对外贸易：按照一定规模和时间表推动经济增长（能为这些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和繁荣）的首要战略是经济一体化。加强贸易一体化不仅能实现增长和创造工作岗位，而且能够提供纪律和激励，有助于采取正确的改革战略。一个面对国际竞争开放的国家，必然会发现进行下面列举的其他改革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因为这些改革将有助于其进行竞争。

2. 改善商业环境和完善融资渠道：繁杂的规章制度阻碍该地区的工作岗位创造和经济增长。以埃及为例，该国目前有不少于 3.6 万项规章制度在影响着私人部门。埃及绝不是唯一一个受繁重立法所累的国家。事实上，很多新的政治党派以小企业业主的支持为基础，这个群体把商业环境的改善视为关键的优先事项。在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中，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主要约束是企业缺乏融资渠道。现在，私人信贷主要惠及大型成熟企业，只有 10% 的企业通过银行为其投资进行融资。此种水平的银行融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

3. 增强劳动力市场和提高教育水平：埃及、约旦、摩洛哥以及突尼斯的年轻人失业率介于 18% 到 30% 之间，在埃及，每年有 65 万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妇女在找工作时面临着特殊的难题——在埃及、约旦、摩洛哥和利比亚，只有大约 1/4 的女性人口有工作。公共部门支配着劳动力市场，而且劳动法死板僵硬。政府应该减少对招聘的抑制，同时仍然要保护工作者。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也不足，而且缺乏工程和科学方面的技术能力。教育体系必须把重点从培训年轻人成为公务员，转向为他们在私人部门工作做准备。

4. 取消非针对性的补贴，代之以现代化的社会保障网：2011 年中东和北非的价格补贴花费了 2,100 亿美元，超过了地区 GDP 的 7%。除了成本高昂以外，这种价格补贴无法帮助穷人。针对那些确实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保障，其实更为有效率和有效。为了获得公共支持，必须清楚地解释改革措施，同时作出可信的承诺：补贴资金将用于投资，同时脆弱人群将会得到保护。

国际社会的作用

当考虑上面所描述的两个不可取路径的潜在成本时，以及考虑第三种路径对该区域及世界经济的益处时，非常明显，国际社会应该提供充足的融资、贸易渠道以及政策建议，以支持积极的变革。

在 IMF，我们试图应对这些挑战。在这段困难时期，我们一直为各个国家就以下问题提出建议：如何通过应对它们所经历的冲击来保持经济稳定，如何确保脆弱家庭在转型时期受到保护以及如何为创造就业的增长奠定基础。

加强贸易一体化不仅能实现增长和创造工作岗位，而且能够提供纪律和激励，有助于采取正确的改革战略。

我们的参与已经从主要提供建议转换到了帮助融资。单是去年，我们就向约旦、摩洛哥和也门提供了 85 亿美元的贷款。对埃及政府的一揽子支持措施也已经制定好，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后续安排来帮助也门，以补充我们去年所提供的紧急援助。我们也准备好了为突尼斯提供财政援助。利比亚需要能力建设而不是融资，我们增强了支持，以帮助该国在 2011 年的冲突结束后重建其制度和经济。

尽管 IMF 可以帮助各国实现稳定并进行经济改革，但任务非常重大，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由八国集团（G8）在 2011 年发起的“多维尔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协调框架，但其本身并不能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对于国际社会（包括八国集团成员国，区域合作伙伴，例如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以及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来说，提供足够的融资和能力建设至关重要。欧盟和美国必须对来自该地区的产品和服务给予更好的贸易渠道。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宝贵经验，能够加快私人部门的投资步伐——正如东欧和中欧所发生的那样。

中东和北非的每一个国家必须开拓出自身的变革路径。变革过程必须是完全参与式的。广泛的认可将必不可少，从技术上来看无论多么合理，改革计划都不能从上而下强加实施。

必将就引人注目的共同愿景达成一致意见。回到旧秩序的风险是太真实了。但有意义的改革的回报也是可观的。如果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实现的增长率能够比预期超出 2 个百分点，那么就能在五年内把失业率降低一半。那将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贸易、增长与就业

加强贸易一体化有利于中东地区的 增长与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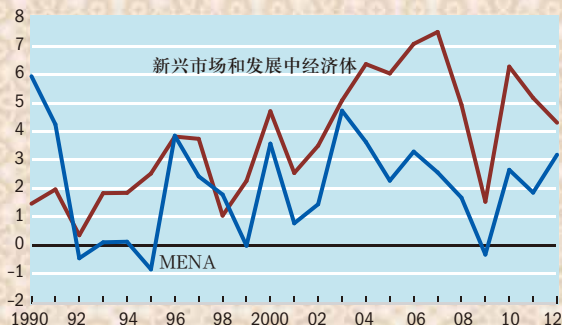
过去 20 年间，中东和北非地区 (MENA) 国家在经济增长和贸易方面均落后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作为这些经济体增长引擎的贸易在 MENA 国家也未能发挥作用。MENA 地区疲软的经济增长已制约其就业增长，缺少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快速增长的劳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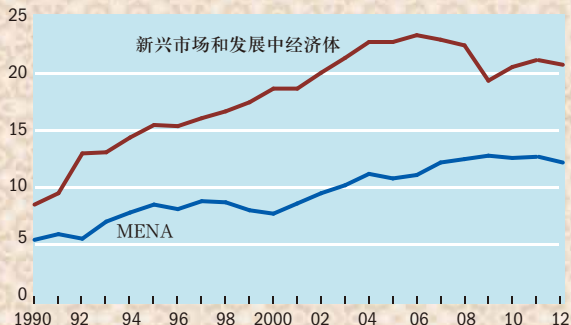
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工人正在扬晒大麦。

MENA地区的人均GDP和出口均大大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值。

(实际人均GDP, 年度百分比变化)



(非石油产品出口, 占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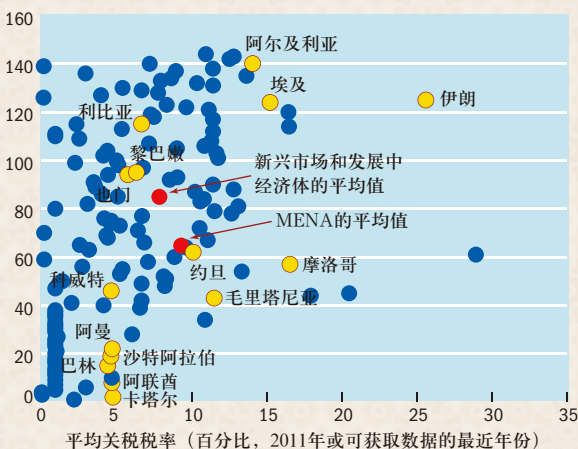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市场准入

贸易限制是阻碍该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实施了显著的关税改革, 但该问题依然严重。在过去 20 年间, 大多数 MENA 的石油进口国已经简化并降低了关税, 这通常是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协定来进行的。但是石油进口国的关税仍然很高, 2011 年的平均关税达到了 10%。

在调查的139个国家中, MENA国家的贸易限制相当多。

(总的关税壁垒, 级别分为1—144, 其中1代表限制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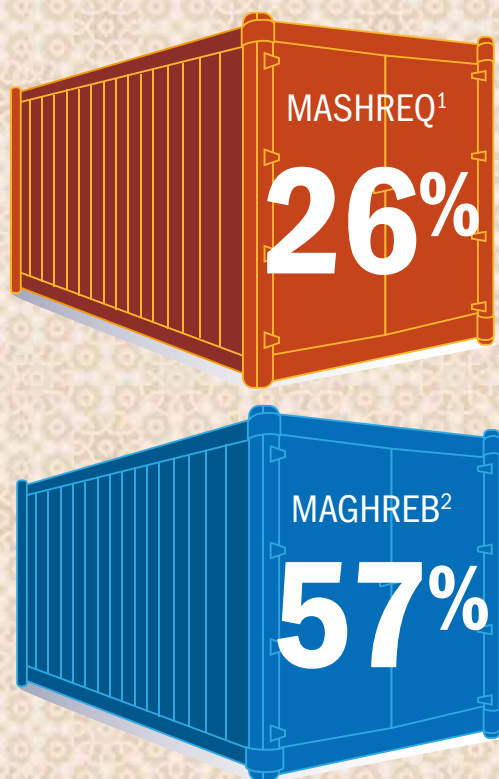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世界经济论坛, 《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2—2013年》。



欧洲是 MENA 地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

(对欧盟的出口，占总出口的百分比，2011 年)



资料来源：IMF，《贸易流向统计》数据库。

¹ 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

² 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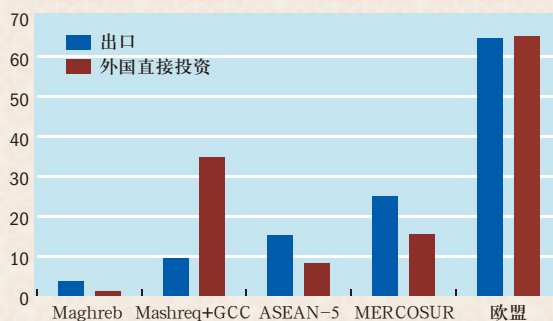
巴林哈德的哈里发·本·萨尔曼港口。

区域一体化

贸易，尤其是北非国家的贸易，仍然主要面向欧洲，因此使得该地区从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高增长中受益相对很少。与国际市场更深入的贸易联系可以促使 MENA 地区的经济大幅增长。实践经验表明，将该地区的开放程度上升至与新兴亚洲经济体相同的水平，可使其年人均 GDP 上涨近一个百分点。MENA 地区的石油进口国也很少同其最近的邻国进行贸易。由于两者在离得很近（距离在贸易中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国家的出口能够超过现有水平的 50% 以上。

NEMA地区内的贸易量仍非常低。

(地区内的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比，2011年或可获得数据的最近年份)



资料来源：ASEAN；EUROSTAT；IsDB；UNCTAD；阿拉伯投资及出口信用保证公司；各国提供的资料。

注：Maghreb=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Mashreq+GCC=埃及、约旦、黎巴嫩、利比亚、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MERCOSUR=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ASEAN-5=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本文由 IMF 中东和中亚部的艾敏·玛蒂 (Amine Mati) 撰写。图表和正文基于《地区经济展望：中东和中亚》(多期)。

非常规油气开采 蓬勃发展



托马斯·何浦林

由于高价格和新技术的应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撼动全球能源市场

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天然气和石油产量的强势反弹令市场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大跌眼镜（见图1）。其结果是，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处于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美国中西部内陆地区生产的轻质低硫原油的售价远低于国际基准价格。

产量的激增，主要来自于生产商从页岩、致密砂岩储层等非常规地质构造

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新能力。生产革命先后发生在天然气开采和最近的石油开采过程中。

普遍认为，页岩气资源的可用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天然气作为能源的前景。但是，非常规页岩和致密砂岩储层油气开采的前景仍不十分明朗。天然气能源的发展究竟是预示着石油价格的长期下跌，就像由1973年中东战争引发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石油产量激增所导致的那样？还是与之相反，生产革命有无法持续的风险？此外，石油价格的急剧变化（即所谓的石油危机）对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影响又将如何改变？

由高石油价格所引起

近几年来，非常规来源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激增是高油价和新技术相结合的又一案例，合力将以前不合算的资源转化为经济上可行的资源。以石油价格在1973年年末的大幅上涨为例，北极（阿拉斯加）和北海的新的石油资源开发变得经济可行，并最终促成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石油价格下跌。



一般来说，开发新的供应来源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正常反应，且历史上一直是价格上涨时拉低价格的背后力量之一。在美国油气生产革命背后的技术和地质学发展也是导致油气燃料价格下降的原因（见专栏）。

非常规来源油气革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问题：经济上可行的额外石油和天然气可开采量，及其对价格和市场的长期影响。无论如何，随着市场的调整，生产革命的道路短期内都将崎岖坎坷。

供应潜力的衡量

2008年至2012年间，美国非常规来源生产的原油增长了约五倍，2012年年底达到接近每天100万桶。平均而言，页岩油，或称轻紧（light tight oil）油，占美国2012年原油总产量的约16%，130万桶新增原油日产量的近3/4。

到目前为止，石油产量的增加，反映在了巴肯页岩区（Bakken Shale）的油田开发中。巴肯页岩区横跨西部的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但在2012年，得克萨斯州的伊格福特页岩区（Eagle Ford Shale）的生产也开始迅速扩大。伊格福特地区的产量预计将继续扩大，而新油田的开发和开采将从其他已知的页岩储层开始。如果产量要进一步增加，那么扩大开发其他的页岩储层是必要的。

此时，美国从页岩和致密砂岩储层中开采石油的最终潜力仍是不确定的。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技术上可采但尚未开发的页岩和致密砂岩石油资源，估计在240亿桶，不足2012年全年全球石油消费量（U.S. EIA, 2011年）。但以上估计是基于2009年的数据，这样的预言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一方面，最终开采的通常只是技术上可采石油资源的一小部分，因为不是所有的开采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新的供应量大到足够超过需求，价格可能会下降，进一步降低了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新开发油气层的可采资源量的估计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为随着认识和经验的增加，对开采的估计也会更乐观。最近的估计认为，非常规页岩和致密砂岩石油资源的技术可采量达到330亿桶（U.S. EIA, 2012年）。此外，不仅估计的认知有影响，技术逐步普遍提升也可能会导致最终的开采量高于最初的估计。

最近的美国石油产量中长期展望普遍预测来自这些新来源的原油日产量将再增加150万—250万桶，然后在未来的2—3年里稳定在250万—350万桶。当所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非常规来源的产量水平将使美国原油日产量达到约800万桶，一些估计则更为乐观。

新的石油来源的多少会多大程度影响价格，取决

非常规来源石油和天然气革命

石油和天然气长期以来产自所谓“常规来源”：在地壳中天然压力的帮助下将油气资源从钻井输送到地表。

美国长期以来已知页岩、致密砂岩储层等其他地质构造中包含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是，这些储层中的燃料并不能用常规来源同样的方式开采出来。相反，生产商结合水平钻井和水压致裂技术（hydraulic fracturing），或“压裂法（fracking）”，注入液体，通过高压破裂储层释放其中所含化石燃料。这两种技术的使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使用它们的成本比原油和天然气的售卖价格还要高，直到最近。

近年来，油气价格猛涨，这种状况彻底改变了。生产商开采这些储层中的石油和天然气已能够盈利。同时，水平钻井和水压致裂技术的改进降低了使用成本。

特定因素促进了美国的页岩革命。首先，地下矿产资源的权利由私人所有，土地拥有者可以出租这些权利，这使得小型独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更容易愿意承担风险，并推动技术改进。其次，有竞争力的天然气市场的存在，使页岩气生产商可以与所有其他生产商一样，进入分销网络推销他们的产品。较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长期以来对新的油气来源一直持怀疑态度，只是最近才开始投资这项技术。

于全球供给的变化。石油市场是充分一体化的，其价格调整基于全球的供给和需求。在过去的五年中，美国原油产量的增加一直是12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见图2）成员国以外的最重要的新增产量来源。但产量增幅仍然很小。在目前的石油产量中，来自于美国开采的非常规来源石油量平均只占到2012年全球约900万桶石油日开采总量的1%略多。如果石油需求不变，价格可能会下降更多。但最终的结果是，美国新增石油产量仅大致相当于全球石油消费的增长。因为其他地区的石油产量少有增加，2012年美国新增石油产量最终只是促进了石油价格的相对稳定。

如果最近进一步的全球石油产量增长的预测是准确的，新油源本身，就如同20世纪70年代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供给增加一样，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石油供给的前景。事实上，许多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生产国的累计产量发生强劲的增长（见图3）。也就是说，美国的非常规来源石油生产在短期内会促进全球石油供给扩大。如果供给迅速扩大的潜力，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能实现，特别是伊拉克，石油市场的供给紧张状况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得到缓解。从长期来看，页岩和致密砂岩储层石油也可以在其他地区生产，因为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地质构造（英国石油公司，2013年），但这些国家还没有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勘探和开发。

不管其如何影响全球供给和价格，新的来源对美

国石油生产商都具有重要意义。预计技术可采石油资源约是目前美国石油年产量的10倍。即使条件允许的最终开采量低于预期，美国的石油产量仍将大大增加。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不久前的展望，该展望预计美国石油产量将继续减少。

不仅仅是原油

美国非常规来源石油和天然气革命，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远不止于原油产量的增加。作为非常规来源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结果，2008—2012年间，丙烷和丁烷天然气凝液（NGL）产量增加约30%。这些天然气的副产品也很重要，因为消费者关心的不是原油，而是可用的汽油。2008—2012年，原油和天然气凝液产量的一起增加使得液体燃料的日产量从约69万桶增至87万桶，增长26%。

此外，天然气凝液产量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目前估计，美国页岩气资源十分可观。美国能源信息署的研究还得出结论，未开发的页岩气资源的技术可采量为7,500亿立方英尺，约是美国天然气年产量的31倍。最终的开采必将是小规模，但最近几年美国探明天然气储量的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页岩气。而美国天然气的估计储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断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则停滞不前。

美国天然气市场仍在因页岩气产量的突然增加而

调整。在过去的几年中，相对于煤炭和原油其他能源，以美元计价的天然气价格已经下降到了几十年前所未有的水平。

到目前为止，石油市场已经开始不受美国天然气富余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天然气被美国电力部门所使用，因为许多发电厂能用天然气代替现在相对更昂贵和有污染的煤炭来发电。但是从长远来看，其他行业也有潜力转而使用天然气。甚至交通也可以使用天然气，因为天然气也可以在内燃机中使用，而现在内燃机主要依靠汽油或柴油等炼制的石油产品。

如果有广泛领域使用天然气替代石油产品，全球石油市场会受到影响。价格的激励作用明显。以能源当量计算，美国的天然气的价格仅是汽油或柴油价格的零头。天然气丰富的储量强化了价格的激励作用。由于转换使用天然气通常涉及新增投资，只有当天然气价格在整个项目周期保持相对较低才会有吸引力。此外，天然气潜在的丰富储量并不限于美国。美国地质调查局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包括中国和阿根廷在内的其他国家也蕴藏着大量可用页岩气资源。但其他国家能否复制美国页岩气生产的成功经验，进行非常规来源石油开采，断言仍为时尚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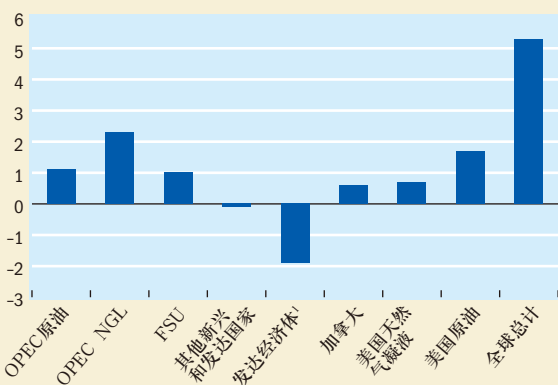
短期市场的不稳定将阻碍非常规来源石油革命吗？在美国天然气市场，最近的价格下降增加了页岩气革命弄巧成拙的可能性。当价格降至维持其生产所需的水平以下，将会适得其反。在美国的石油市场的情况截然不同，其仅仅只是全球石油市场的一部分，

图2

突出的美国

在过去的五年中，美国原油产量的增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以外最重要的新增产量。

（液态石油产量的增长，2008—2012年，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国际能源机构和美国能源信息署提供的数据的计算。

注：NGL=天然气凝液，例如丙烷，是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品。FSU=前苏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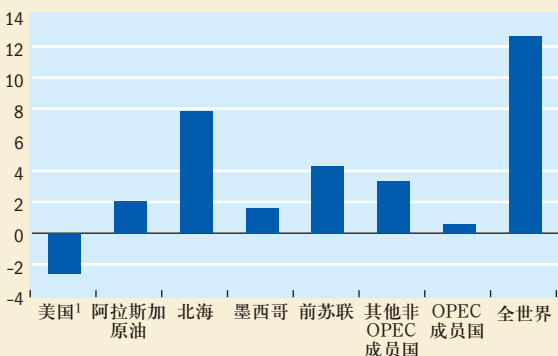
¹美国和加拿大除外。

图3

发展壮大

20世纪70年代，众多非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大幅提高了石油产量。

（对全球液态石油产量的增长的贡献，1975—1979年，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基于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能源信息署提供的数据。

注：NGL=天然气凝液，例如丙烷，是天然气生产的副产品。美国包括除阿拉斯加州以外的其余48个州。

¹包括天然气凝液。

而事实上又代表了整个全球市场。这就是说，市场一体化迄今已遇到内部分销基础设施瓶颈的暂时阻碍，并没有扩大到足以容纳所有新来源开采的石油。页岩和致密储油层石油生产商们的石油产品无法进入全球市场，迫使他们以高于成本，但却远低于相同等级石油国际基准价格的价格出售。然而，分销基础设施已经开始进行升级。假设生产商能克服协调的问题，并且管制壁垒有所调整，分销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提供海运国际石油贸易条件，并最终使当地的价格更接近国际市场的价格。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潜在的环境破坏，这不利于开采的扩大。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此项新技术会导致地下水污染。而这是公众所担心的进行油气开采的主要问题。

非常规石油与美国经济

如果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产量如同预期那样增长，其仍将是美国投资和就业的一个重要来源。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和挖掘相关活动的就业人数，在过去10年中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在此之前的20年中却不断下降。在这两个部门工作的员工，从2004年年初的大约30万名，增加到2012年的大约57万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复苏也将刺激其他部门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

由于国内产量增加，天然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净进口量明显下降，从2005年的约1,250万桶/日的峰值，降至2012年的约770万桶/日。除了更高的国内产量，净进口的下降也反映了高油价对消费的影响。天然气的进口量下降相对较大，从约3.6万亿立方英尺的峰值，降至2012年的约1.6万亿立方英尺。因为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以价值计算的石油贸易赤字（包括原油和石油产品）下降的幅度要小。该赤字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2.7%左右的峰值，现在则低于2%。如果如市场预期，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保持较高水平，较小的石油贸易赤字将使整体贸易状况和经常项目余额持久改善。美国的大量石油财富可能会对美元产生一定升值压力。

新能源基地也可能改变石油价格冲击对美国的影响，虽然如何改变仍是未知数。似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石油危机的财富转移效应将发生改变。如果石油价格飙升，从美国转移到国外供应商的财富将小于以前，因为高价带走财富的更大份额将留给国内的石油生产商和美国居民。相反，如果石油价格下降，美国将较少受益于价格的下降，因为国内的石油生产商将承担更大份额的低价损失。非常规来源石油革命可能会影响其他两个关键因素——家庭消费和工业消费，这两个因素将决定石油价格冲击对经济增长和通

货膨胀的影响(Blanchard和Galí, 2009年)。虽然家庭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减少对石油的消费，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可能使用天然气代替石油。这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将降低石油危机的影响。与此相反，如果石油化工生产商将石油和天然气密集型工业搬迁到美国，那么石油作为生产的中间投入的份额可能会增加。

要评估其他国家是否可以复制美国页岩气生产的成功经验，还为时尚早。

总之，美国和其他地区意外出现的或是潜在的非常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如果其开采经济上可行，将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天然气将可能成为另一个重要的主要能源，其在能源总消费中的份额可能会大幅增加。此外，美国不太可能成为最大的天然气净进口国，就像前几年预计的那样。

页岩或致密砂岩石油的影响似乎也没有那么深远。就其本身而言，由于石油消费量的持续增长，新的来源能缓解但不能消除自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石油供应瓶颈，因此也不可能对价格施加强大的下行压力。但是，页岩革命凸显了价格激励和技术变革会引发石油和天然气部门重要供给反应的现实，而且供给的约束会随时改变。在全球范围内，新来源的全部潜力仍是未知数，因为对美国以外地区的勘探和开发才刚刚开始。■

托马斯·何浦林(Thomas Helbling)是IMF研究部的处长。

参考文献：

Blanchard, Olivier J., and Jordi Galí, 2009,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Oil Price Shocks: Why Are the 2000s So Different from the 1970s?" i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Monetary Policy*, ed. by Jordi Galí and Mark Gert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itish Petroleum, 2013, *Energy Outlook 2030* (London).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S. EIA), 2011, *Review of Emerging Resources: U.S. Shale Gas and Shale Oil Plays* (Washington). www.eia.gov/analysis/studies/usshalegas/pdf/usshaleplays.pdf

———, 2012,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2* (Washington). [www.eia.gov/forecasts/aeo/pdf/0383\(2012\).pdf](http://www.eia.gov/forecasts/aeo/pdf/0383(2012).pdf)



因不确定 而掣肘

尼克拉斯·布鲁姆、M.阿汗·科斯、马可·E.特隆尼斯

工商界和消费者因对未来不确定，造成经济复苏进程放缓

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指出，美国和欧元区在度过了2008—2009年“大衰退”的非常时期后，将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恢复期。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将此称为“吉他琴弦”萧条理论。当你将一根吉他琴弦拉紧，然后放开时，琴弦会反弹回去。你拉得越紧，琴弦反弹得越快。

然而，大衰退以来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却没有遵循这一理论。相反，这些经济体的严重衰退却伴随着脆弱而缓慢的经济复苏，这很令人失望。这就像吉他琴弦拉得过紧而断弦一样。

这些进展充满谜团：为什么当前的经济复苏如此缓慢？一些人指出，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一般来说会迟缓，这是因为危机造成的后果（资产负债表的修补、脆弱的信贷扩张、住房市场接二连三的问题）严重阻滞了经济活动（例

如，Claessens、Kose 和 Terrones, 2012 年）。考虑到历史记录，这种观点的确有其道理。

但是，目前的经济复苏至少在一个重要领域与先前的危机后复苏有所不同，且不论这些复苏是否伴随着金融危机。此次复苏伴随着程度更高的不确定性。这种观点强调了宏观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在萎缩的经济活动中的影响，从而对当前“贫血性”复苏给出了一个补充性解释。工商界对美国和欧洲的财政和宏观调控环境心存疑虑，这种对未来不可知的担心有可能成为阻碍他们投资和雇人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在近期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的一项民调（《经济政策调查》，2012 年）中有明显体现。该民调指出，一个由 236 位商界经济学家组成的工作组中，“绝大多数感觉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减缓经济复苏的

对不确定的度量

量化不确定性是一大挑战，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观测的变量，只能通过其他变量推导出来。用统计学的语言，不确定性是一个潜变量。

使用一些度量方法，来凸显一个经济体在一个时期所面临的不确定的各种因素，这样可以通过很多途径间接地测度不确定性。一些度量方法着重在宏观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些方面包括股市收益的波动、失业预测的离差以及媒体中一些流行的词条（比如，经济不确定性）。其他的度量方法则考虑了微观经济方面的情况，比如部门产出、企业销售、股票收益以及生产企业经理所做出预测的离差等不同的指标（Bloom，2009年；Baker、Bloom和Davis，2012年）。

由于我们主要考虑宏观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我们基

于股票收益的波动性和经济政策着重于四种度量方法。第一种度量方法是：21个样本经济体的每个经济体中，每天股票收益的月度标准离差。此方法测度到与企业利润相关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较好地代表了整体经济的不确定性（见图1）。第二个度量方法是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VXO），表明标普100期权的证券价格的隐含波动。第三个度量方法是美国和欧元区围绕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以下三个指数的加权平均：媒体中出现类似“经济政策”和“不确定性”等词条的频率；未来年份将要失效的税务法规的数量；对未来政府开支和通货膨胀预期的离差（见图2）。第四个度量方法，代表全球水平的不确定性，使用六个发达经济体最长时间序列数据，找出第一个度量方法中的共同变化（图1）。

步伐”。

在影响经济活动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如何？本文通过分析不确定性的主要特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答上述问题。

这里、那里、到处有不确定性

经济不确定性是指对未来经济状况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情况。测度经济不确定性的来源有很多，包括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变化，对增长前景、生产率变化、战争、恐怖主义行为以及自然灾害的不同观点等。尽管不确定性很难量化，通过利用范围宽泛的手段，近期研究已经能够开发出一些度量方法（见专栏）。

使用哪种度量方法并不重要，很明显的是不确定性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加大（见图1）。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而且自那以来一直未见弱化（见图2）。美国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争论不休的财政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包括税收和政府支出、长期结构问题（比如医疗卫生和调控政策）以及津贴项目（比如政府资助的退休计划Social Security和老年医疗计划——Medicare）。有趣的是，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似乎没有成为近期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可能是缘于较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和利率。

在国家层面，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与商业周期相反。平均而言，无论我们使用哪种度量手段（见图3），在经济扩张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比经济萧条期要低得多。美国有关特定行业或公司的微观经济不确定性，使用工厂层面的生产率变化的波动性来度量。同样，这一不确定性也显出反周期性的特点，在大衰退期间达到20世纪70年代来的新高（Bloom等，2012年）。

不确定性和经济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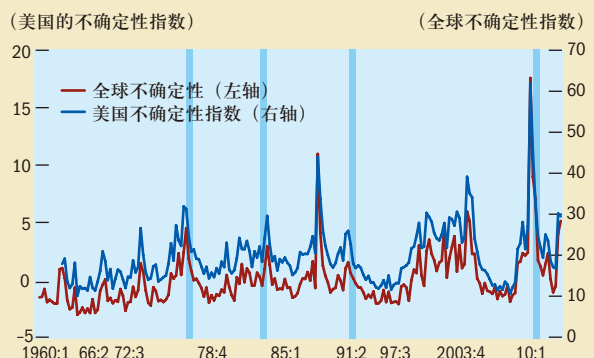
然而，在不确定性和商业周期之间建立因果关系是困难的。是不确定性造成了经济衰退抑或经济衰退导致了不确定性？尽管难以对这一问题作出定论，经济理论的确指明了途径，表明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有负面影响。

在需求一边，例如，当面对较高的不确定性时，随着厂商搜集到新信息，厂商会减少投资和推后项目，因为如果投资逆转的话会代价高昂（Bernanke，1983年；Dixit和Pindyck，1994年）。居民对较高不确定性的反应与厂商的类似：他们在等待不确定性降低的同时，

图1

不确定性在上升

在历次经济复苏期间，不确定性出现上升；在大衰退期间更是显著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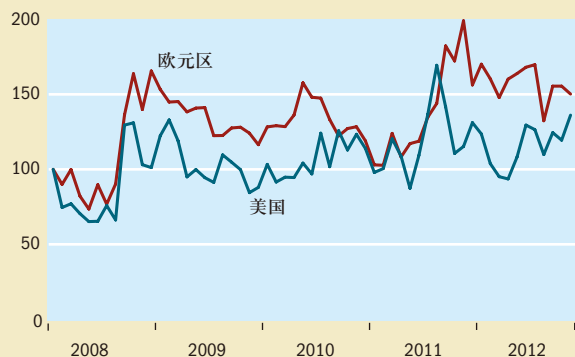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Kose、Loungani和Terrones（2012年）；作者计算。
注：阴影区是指全球萧条期（1975年、1982年、1991年以及2009年）。美国的不确定性指数度量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以及股市波动。全球不确定性指数着重在六个发达经济体的股市波动的共性。这六个国家是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图2

居高不下

美国和欧元区的政策不确定性自2008年以来居高不下。

(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2008年1月=100)



资料来源: Baker、Bloom和Davis (2012年); www.policyuncertaint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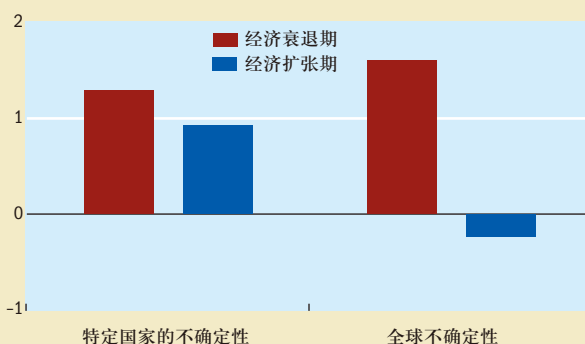
注: 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度量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股市波动; 媒体对“经济政策”和“不确定性”的频率; 未来年度将失效的税务法规的数量; 对未来政府支出和通货膨胀预测的离差。

图3

周期性波动

无论从某个特定国家还是全球来看, 经济衰退期间的不确定性比经济扩张期间的要高很多。

(不确定性指数)



资料来源: Kose和Terrones (2012年)。

注: 特定国家的不确定性指每个发达经济体每日股票收益的月度利差。全球不确定性指六个经济体的特定国家不确定性中的共同点。这六个国家是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数据时间涉及1960—2011年。

会减少对耐用品的消费。在供应一边, 厂商的雇人计划也受到更高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这反映出代价昂贵的人员变动。

政策导致的不确定性同样与增长呈反向关系, 大衰退以来政策不确定性达到历史高位。特别是2006—2011年间政策不确定性的急剧增加严重影响了发达经



使用哪种度量方法并不重要, 很明显的是不确定性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加大。

金融市场的问题, 像2007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可以放大不确定性对增长的负面影响。例如, 对那些用债务来融资的项目, 不确定性导致降低对这些项目收益的预期, 而且更难于评估担保的价值。其结果就是, 债权人会收取更高的利息, 在不确定期限制放款, 这将降低厂商获得资金的能力。借款的减少造成投资的减少, 特别是对那些信用约束性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同时, 由于在研发领域开支的减少, 还造成了生产率更为低下的增长。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会转化为产出增长的显著放缓。

经验证据表明, 不确定性会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产出增长率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呈负相关性。进一步来说, 不确定性每增加相对小的1个标准离差, 根据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度量方法的不同, 将会对产出增长造成0.4个百分点到1.25个百分点的减少(Kose和Terrones, 2012年)。

济体的增长(Bloom, 2009年; Baker和Bloom, 2011年; Bloom等, 2012年; Hirata等, 即将出版)。经验证据表明, 这些政策不确定性的较大增加与极为顽固的显著的产出下降有关(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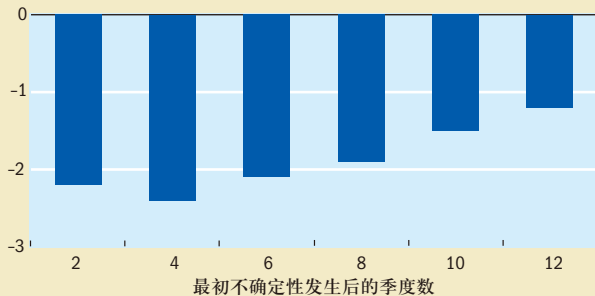
经济不确定性还与经济衰退的深度和经济复苏的力量有关。特别是伴随着较大不确定性的衰退通常比其他经济衰退更为严重(见图5)。类似地, 伴随着较大不确定性的经济复苏, 将比其他情况的经济复苏更为虚弱。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经济经历的不同寻常的较高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关的程度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更为虚弱的经济复苏, 都是这些发现的很好的证明。进一步来说, 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复苏与以下情况相吻合: 不确定性持续增加, 伴随着建筑物投资的明显而持续的减少, 消费和投资领域出现更低的累计增长(Kose、Loungani和Terrones, 2012年)。

图4

令人沮丧的效果

政策不确定性的较大增加与极为顽固的显著的产出下降有关。

(GDP下降, 百分点)



资料来源：Baker、Bloom和Davis（2012年），
www.policyuncertaint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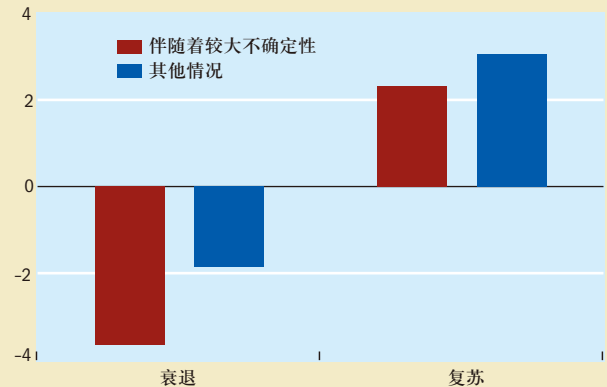
注：该图显示了在第一个季度不确定性增加后，GDP在第二个季度下降了2.2%，在第四个季度下降了2.4%，以此类推。假定2006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一年）到2011年的年度不确定性的增幅相同。这些结果基于被称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数量经济模型。该模型使用1985—2011年的季度数据以及以下变量：不确定性指数、GDP、标普500指数、联邦基金利率、就业、投资和消费。

图5

不确定性很麻烦

伴随着较大不确定性的经济衰退通常比其他经济衰退更为严重，经济复苏通常比其他复苏更为虚弱。

(衰退和复苏的振幅, 百分比)



资料来源：Kose和Terrones（2012年）。

注：衰退的振幅指产出从顶峰到低谷减少的百分比；复苏的振幅是产出从衰退低谷上升的年度变化。

决策者可发挥作用

从历史上看，较强的不确定性出现在较低的经济增长期。近期不确定性的提高，增加了再一次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对于决策者来说，克服那些经济体在商业周期领域所面对的固有的不确定性是困难的。然而，经济政策领域的不确定性不同寻常地高，看起来显著地推动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通过实施大胆而及时的措施，大西洋两岸的决策者能够减少政策导致的不确定性。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并推动美国的经济复苏。■

尼克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是斯坦福大学教授，M.阿汗·科斯（M. Ayhan Kose）和马可·E.特隆尼斯（Marco E. Terrones）是IMF研究部的主任助理。

参考文献：

Al-Hussainy, Ed, Andrea Coppola, Erik Feyen, Alain Ize, Katie Kibuuka, and HBaker, Scott, and Nicholas Bloom, 2011, "Does Uncertainty Reduce Growth? Using Disasters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Palo Alto, California).

Baker, Scott, Nicholas Bloom, and Steven J. Davis, 2012,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Palo Alto, California).

Bernanke, Ben, 1983, "Irreversibility, Uncertainty, and Cyclical Invest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8, No. 1, pp. 85-106.

Bloom, Nicholas, 2009, "The Impact of Uncertainty Shocks," Econometrica, Vol. 77, No. 3, pp. 623-85.

Bloom, Nicholas, Max Floetotto, Nir Jaimovich, Itay Saporta-Eksten, and Stephen Terry, 2012, "Really Uncertain Business Cycles," NBER Working Paper 182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laessens, Stijn, M. Ayhan Kose, and Marco E. Terrones, 2011, "Financial Cycles: What? How? When?" in NBER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Macroeconomics 2010, ed. by Richard Clarida and Francesco Giavazzi, pp. 303-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12, "How Do Business and Financial Cycles Intera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87, No. 1, pp. 178-90.

Dixit, Avinash K., and Robert S. Pindyck, 1994,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irata, Hideaki, M. Ayhan Kose, Christopher Otrok, and Marco E. Terrones, forthcoming, "Global House Price Fluctuations: Synchronization and Determinants," in NBER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Macroeconomics 2012, ed. by Francesco Giavazzi and Kenneth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ose, M. Ayhan, and Marco E. Terrones, 2012, "How Does Uncertainty Affect Economic Performanc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Box 1.3, pp. 49-5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Kose, M. Ayhan, Prakash Loungani, and Marco E. Terrones, 2012, "The Global Recovery: Where Do We Sta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Box 1.2, pp. 38-4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 forthcoming, "Global Recessions and Global Recoveries,"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conomic Policy Survey, 2012,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 (September).

发展的程度

新的数据表明，一个国家公务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拉巴·阿瑞兹克、马克·昆廷

国民教育程度通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学家强调，从理论上讲，教育通过三个主要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即教育增加劳动力生产率，提高生产水平；教育通过改善投入、加强加工流程和生产更好的产品，使技术创新成为可能。教育推动了知识的传播和新技术的推广，从而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教育促进经济增长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水平并没有得到适当地测算。教育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传统上使用基于普通人群受教育年限的方法（见专栏1）。但这种研究方法由于只考虑了受教育的年限而没有考虑教育质量而饱受诟病。当通过测算认知技能

来考察学习问题时，会发现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更紧密的联系（Hanushek

专栏1

衡量教育水平

大部分关于教育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例如，Barro 和 Lee 对 146 个国家在 1950—2010 年期间的所有成年人口按照性别和年龄分组，以 5 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衡量。他们发现各国普通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极大，富裕国家普通人群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 11 年，而贫穷国家普通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 年。

但其他关于两者之间联系的研究却没有明确的结论，这也是研究人员寻求更好的方法来衡量教育及对治理和发展贡献的原因，如使用认知技能来衡量教育水平。



和 Woessmann, 2008 年)。

几乎在所有国家，政府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决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经济学家所言，一国聪明和公正地治理国家的能力，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分析普通人群的教育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都毫无用处。公务员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会与普通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有所不同。研究人员重点研究了领导层，研究结果表明，高层的教育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确实有影响 (Jones 和 Olken, 2005 年; Besley、Montalvo 和 Reynal-Querol, 2011 年)。但是，尽管领导层制定了管理政府的各项制度和发展方针，但并不是由他们具体推动实施。

我们再重点研究下一个层次，考察公务员的受教育质量。这些公务员日复一日地影响政府政策的设计和和执行。我们发现公务员受教育程度越高，政府的治理能力越强，能够制定更好的决策并最终实现经济的更快发展。从过去 30 年超过 10 万名申请参加 IMF 经济学培训的公务员简历所建立的独特的数据库中，我们能够对公务员的受教育程度进行测算 (见专栏 2)。

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公务员教育质量的差异，我们能够获得经济发展为何会出现差异的更多认识。我们还进一步探讨了为什么一些拥有高质量公务员队伍的国家最终崩溃，我们认为，在政府部门采取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有助于吸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

受过良好教育的公务员

超过 10 万名应聘 IMF 的人员是其国家中央银行或财政金融部门的中层公务员。通过使用这些简历数据，我们能够找到教育质量和国家能力各方

面之间的关系，这些能力包括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物品开支和税收征收等方面。尽管普通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数据能够获得，但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数据很难获得。事实上，我们对政府部门特点了解非常少，对各国公务员数量的信息也很难连续获得，更不用说一段较长时期了。数据库旨在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关于政府工作人员教育程度的数据模型来填补这一空白，虽然这些数据主要集中在经济和金融领域。

我们感觉数据范围较全面，涵盖不同年龄组、各种资历以及男性和女性。然而，中央银行和财政金融部门工作人员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个政府部门还难以确定。即便如此，我们仍相信，关注这一很难获得系统数据记录的领域，我们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使用这些数据，我们发现不同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与普通人群有很大差异。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普通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但该地区很大比例的公务员拥有大学学历。

通过计算官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数，我们构建了一个教育程度的质量调整测算方法。我们使用 Universitas——一家全球大学网 (见专栏 3) 的学术

专栏 2

数据库：申请人员简历

本数据是根据 1981—2011 年期间来自 178 个国家申请参加 IMF 培训的 131,877 份公务员简历表格信息编制而成。IMF 能力建设学院的参与培训人员与申请人员的跟踪系统保存这些简历，简历信息包括居住国家、机构、年龄、性别、职位和详细教育背景 (如学位、毕业机构和海外学习经历等)。IMF 能力建设活动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所有方面、国家统计和更专业的课程 (如金融)。课程或者在某个地区讲授，或者在 IMF 总部华盛顿特区讲授。申请人由其本国提名或本人自己申请。

专栏 3

评定学术等级

Universitas——一个全球大学网，依据各经济体大学的整体学术记录以及大学教授和较高教育学位的市场价值 (反映在具有较高教育水平人员的失业率上) 出版物等措施，对各经济体进行评级。对所有 48 个经济体的评级结果表明，美国排名第一，英国第二，加拿大第三，印度尼西亚排名第 48。在 Universitas 排名之外的经济体一律被评定为印度尼西亚得分的 25%。除发达经济体外，东亚和中东欧经济体公务员在顶尖的 48 个经济体其中之一学习过的比例最高。更概括地说，发展中经济体中很大比例的公务员曾在国外发达经济体学习过。

评级作为权值。根据其对所有 48 个经济体的评级结果表明，美国排名第一，英国第二，加拿大第三，印度尼西亚排名第 48。当我们考察公务员在何地获得学位时，我们发现，除发达经济体外，东亚和中东欧地区经济体公务员在 48 个顶尖经济体其中之一学习过的比例最高。采用我们的教育质量评定方法，我们发现在公务员质量越高的经济体，经济越能够获得较大增长（见表 1）。当我们抑制初始人均 GDP 影响，凸显处于追赶地位的经济体更容易获得增长这一事实时，这一正向联系依然成立。

教育和政府有效性

政府治理有效性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毕竟，如果国家一个无法遏制腐败，不能保障法律实施并培育有益于私营部门发展的环境，那么实现经济发展的前

以及基于《国际国别风险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2012 年) 数据获得的腐败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政府部门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与腐败较少发生有相关性。这些发现表明，一个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政府工作人员能够通过避免滥用公共资金和保护私营企业，最终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

而且，我们发现，一个国家公务员受教育程度较高，该国就能够征收更多的税收。税收征收是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能够征收更多的税收应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治理和建设能力的标志 (Besley 和 Persson, 2009 年)。教育程度指标和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例存在正相关，而且对于所考察的大部分国家，正相关性还非常强。这些发现表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公务员在税收管理以及确保服从、理解和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方面更为有效。

政府管理有效性的另一个方面反映在国家支持、规范和监管私营市场（如国内金融部门）发展的能力，

一支受过更好教育的政府公务员队伍有助于提高国内金融部门标准。

景仍很遥远。数据表明，公务员质量调整教育与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各方面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公务员受教育程度越高，腐败和高税收越少，政府金融管理越好，私营市场也会得到更多支持。

政府部门人员更高的教育水平与那些部门腐败较少发生有相关性。图 2 说明了我们的测算的受教育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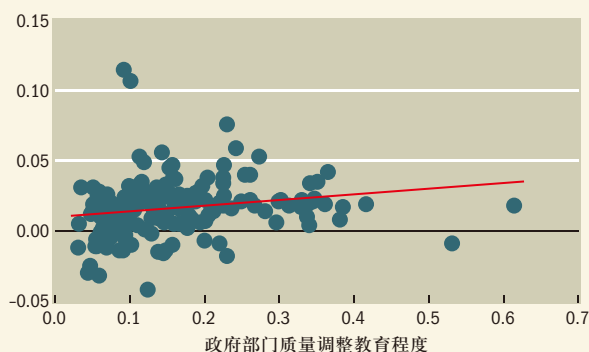
私营市场发展在促进增长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发现，在我们的政府部门教育质量调整测算指标和涵盖国内金融部门标准（包括管理、监督和竞争）复合指数之间，存在正向、统计学和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联系 (Ostry, Prati 和 Spilimbergo, 2009 年)。这表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政府公务员队伍有助于提高国内金融部门标准，随之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和经济增长。

图1

教育增长

公务员良好的受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较快密切相关。

(人均GDP增长，1970—2009年，百分比)



资料来源：Arezki 等 (2013年)；Heston 等 (2009年)。
注：质量调整教育依赖Universitas评级，评分从0（所有政府公务员只拥有高中学历）到1（所有公务员均拥有美国大学博士学位）。

教育与制度

一个关键问题是良好的治理是否是由于公务员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者是否教育是有力制度（如检查、独立司法部门支持平衡）的结果。如果是制度促进了教育，那么公共政策应重点加强某些特定制度，确保有才能的公务人员选择加入政府部门工作，并确保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能够增强认知技能。

最近的研究强调制度在影响经济发展结果方面的作用。例如，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1 年) 验证了制度设置质量（如旨在限制投资者被没收风险的制度），与国家大部分人口人均收入方面的因果关系。Arezki 和 Dupuy (2013 年) 通过该方法建立的理论模型表明，政府部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公务员和社会整体福利之间存在联系。这些发现表明，由有才能公务员制定的决策提高了所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随之带来经济增长。

这一模型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预测，并得到数

据支持。

• 当制度足够健全时，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热心公益的人会比在私营部门更多。原因在于更有力的制度使腐败远离政府部门，限制了由于公务员腐败对公共财富的攫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员一般热心公益，而且更善于提供公共服务。这不仅因为他们拥有优越的技能，而且是因为他们更善于判断何时更适于让私营部门自由发展。预测与图2所示更高的教育水平与较少腐败之间的正向联系直接相关相一致。当优秀人才倾向于在政府部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机构工作时，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更高的经济增长。

给予热心公益人员的奖励提升了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尤其是当制度羸弱时。这样的奖励项目使政府部门对热心公益的人员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提升了提供公共物品能力，促进经济增长。这与我们的经验发现相一致，即基于绩效的薪酬通常与受过较好教育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有关。

• 从政策观点看，我们的发现表明，提高政府效能能够实现，如通过增强司法系统。一个能够推进法律公平实施的有效的司法系统，将可能劝诫公职人员不要试图通过操纵规章制度将公共开支用于自肥，也可能阻止某些有腐败倾向的人员加入公务员队伍。

实施基于绩效的薪酬制度有助于吸引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关于薪酬问题的政策争论目前只集中在私营部门CEO这一很小范围。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关注吸引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员到政府部门工作，以增强提升公共物品的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新加坡是公务员实施基于绩效薪酬制度的国家之一，通过该制度，新加坡能够吸引并维持较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在增强政府有效性方面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使国家拥有良好的经济表现。■

拉巴·阿瑞兹克 (Rabah Arezki) 是IMF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马克·昆廷 (Marc Quintyn) 是IMF能力发展研究所处长。

本文基于作者IMF工作论文12/231，“世界各国政府部门的受教育程度：来自新数据库的证据” (Education Attain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a New Dataset)。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5, pp. 1369-1401.

Arezki, Rabah, and Arnaud Dupuy, 2013, “Public Spirit, Selection, and Weberian Bureaucracies” (unpublished).

Barro, Robert J., and Jong-Wha Lee, 2010,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1950-2010,” NBER Working Paper 1590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esley, Timothy, and Torsten Persson, 2009,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Property Rights, Taxation, and Polit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9, No. 4, pp. 1218-44.

Besley, Timothy, Jose G. Montalvo, and Marta Reynal-Querol, 2011, “Do Educated Leaders Matter?”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1, No. 554, pp. F205-07.

Hanushek, Eric A., and Ludger Woessmann, 2008, “The Role of Cognitive Skil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6, No. 3, pp. 607-68.

Heston, Alan, Robert Summers, and Bettina Aten, 2009,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6.3*,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Production, Income and Pri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August).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2012,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East Syracuse, New York).

Jones, Benjamin, and Benjamin Olken, 2005, “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 3, pp. 83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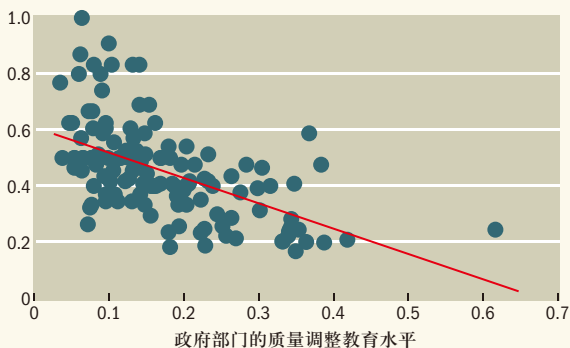
Ostry, Jonathan D., Alessandro Prati, and Antonio Spilimbergo, 2009, *Structural Reform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dvanc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MF Occasional Paper 26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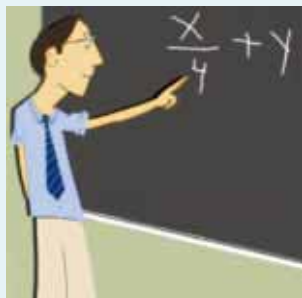
遏制腐败

政府部门更高的教育水平与腐败较少相关联。

(腐败指数)



资料来源：Arezki等(2013年)，《国际国别风险指南》(2012年)。
注：质量调整教育依靠Universitas评级，评分从0(所有政府公务员只拥有高中学历)到1(所有政府公务员均拥有美国大学博士学历)。腐败得分基于《国际国别风险指南》进行计算，评分从1(国家腐败程度最重)到0.17(国家腐败程度最轻)。



什么是结构性政策？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于应对短期经济波动，但有些经济问题是深层次的

卡雷德·阿卜杜勒-凯塔

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而决策者试图根据问题出现的原因，通过一些方法进行补救。

例如，当价格上涨太快，而消费者和企业购买的速度已经超过经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潜能，即总需求增长太快，决策者可以采取使需求下降。同样，在经济处于下行时期，企业和消费者紧闭钱包不消费时，决策者可以采取鼓励消费，或加大政府支出，以弥补缩小的私营活动开支规模。这样的政府行动就被称之为需求管理或稳定性政策。

但有时，一经济体出现的问题由于受政策和私营活动的影响，比需求过度或不足更深、更加持久，这就是供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经济结构作出调整，称之为结构性政策。

短期内，稳定性政策非常重要，因为短期内对总需求的各种要素作出调整要比提高一国的资源的产出更容易实现。稳定性政策包括调整税收和支出（见“什么是财政政策”，《金融与发展》2009年6月号），调整利率和货币供应（见“什么是货币政策”，《金融与发展》2009年9月号）。但在长期，需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改善总供给，政府须解决具体障碍。可能包括经济结构的核心架构，如明确定价机制，管理公共财政，完善国有企业，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劳动力市场法律法规，完善社保网及各种机制等。

近来引发的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要求一些欧元区国家实施大胆的结构政策，而许多增长下滑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需要进行财政、金融、机

构及监管改革，以提高生产率水平。这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同时将为稳定性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舞台。

处理长期问题

结构性政策可能集中在一些领域。

价格控制：自由市场中，价格反映了潜在的生产成本。然而，一些国家政府对商品和服务（如电、天然气及通讯服务等）的定价低于生产成本，尤其是这些商品和服务是由国有企业提供的时候。价格控制导致的损失政府必须进行弥补，这将导致预算和稳定性问题。此外，进行价格控制将比价格正常反映真实的生产成本鼓励增加消费。低于正常水平的定价使社会资源配置扭曲。如果取消控制，价格将升至能够抵消成本的水平，有利于提高竞争和有效性。

公共财务管理：尽管在衰退时期，政府可能支出大于收入，或短时期内税收高于所需以应对繁荣时期的支出，但长期而言，支出和税收应匹配。例如，复杂的税法和税收部门的无效使得税收提高变得困难，而常常引发大规模财政赤字和债务累积（稳定性问题）。这将限制政府为发展提供融资的能力，如医疗保健服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税收改革有助于获得纳税人的支持，并通过取消免税、提前纳税、简化税率结构来提高税收。完善的税务管理

也能够提高税收。例如，通过对税务人员加强培训、提高工资可以减少腐败，培养高素质的员工。

国有企业：在有些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其中有些运营有效，符合消费者的最佳利益。但常常由于没有竞争或竞争很小，国有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很低。由于政治的影响及运营成本较高（例如工人素质低或人数过多等因素），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时常常亏损，而政府必须为国有企业补亏。如果国有企业必须向商业银行借贷以弥补损失，那么稳定性的问题就会出现。由于政府通常为贷款作担保，政府预算就增加了或有负债，因为如果企业无法还贷，政府就得代还。拥有大型国有企业的国家可以将其转让给私营企业或个人，或总体上保持国有，但采取关闭低效和亏损的企业、改进管理或削减劳动力数量、为失业员工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险，以适应企业用工需求等措施。

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是将储户资金提供给借贷者的渠道。完善的金融部门有助于保证资金使用的产出最大化，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和发展。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不发达或监管不善，这会阻碍经济增长，增加稳定性政策实施的难度。例如，央行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向公众发售的债券来执行货币政策。但如果没有所谓的政府债券的二级市场或二级市场不完善，央行要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就会受限，并可能重新采用到原来低效（或不公平）的政策工具，如信贷配给或利率控制等。没有充分监管的银行可能会参与导致银行业危机的风险行为，如储户担忧并挤兑存款时，银行可能关门，或由于不良借贷行为引发倒闭等。但即使是运行正常的银行，如果陷入整个银行体系的挤兑，也可能因支付储户存款使现金枯竭而面临倒闭。银行业危机可能使流向借款人的资金流中断，使人们储蓄意愿降低，如果政府担保储蓄或为银行融资，则可能使政府赤字加剧。决策者可以通过引入二级市场、发展股票市场、推动国有银行私有化等措施完善金融体系。为缓解危机，决策者须通过有效监管来强化金融体系。

社会安全网：政府常设计项目来保证贫困人群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标准。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燃料及食品补贴等花费较高的项目针对性差，富人受益要多于穷人。在发达国家，由于退休人员数量超过劳动力新增数量，现收现付式养老金计划将会出现巨额无备资负债。此外，失业救济金额不菲也是产生高失业率的原因之一，因为雇主需要为雇员缴纳失业保险，所以不愿增加雇工。政府可以调整社会安全网，以加强针对性，同时实现大规模储蓄。为提高对有需求人员的针对性，政府应向低

收入家庭发放在食品领取的凭证，或只在贫困人口集中地区发放食品。政府也应采用转移支付来取代食品、燃料补贴。并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或采用全资

提高经济增长潜能，要求稳定性和结构性政策互相配合。

养老金体系来调整养老金计划，使津贴与预计税收相符合。

劳动力市场：许多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失业现象相当普遍，经济疲弱时失业率通常上升。但有时，失业的原因除商业周期的影响外，还有深层次原因。例如，社保缴纳额过高以及相对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等相关规定，可能推高雇工成本，使劳动力需求萎缩、失业增加。如果工人因缺乏培训或教育而不具备必要的技能，劳动力需求也可能下降。改革教育体系、完善在职培训项目等有助于恢复劳动力需求。

公共机构：公共机构的表现会为国家的经济环境带来显著影响。例如，政府员工（如税务系统员工）工资较低，则可能滋生腐败。此外，法律制度的无效以及法庭、法官数量不足，使企业解决争端不畅，这将增加企业成本、影响投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伤害。可以通过简化企业监管和资质办理、强化国家法律体系、简化税务管理系统、提高从事关键服务的政府职员工资、限制公共部门就业以符合企业需求等来解决。

互相配合

提高经济增长潜能，要求稳定性和结构性政策互相配合。稳定性政策通过降低通胀率、促进消费和投资、降低政府赤字，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只有在宏观经济失衡得以解决的情况下，才能使结构性政策成功实施成为可能。同样，结构性政策可以提高许多稳定性措施的有效性，如促进竞争（结构性政策）可以促使价格下降，进而降低通胀（稳定性政策目标）。■

卡雷德·阿卜杜勒-凯塔（Khaled Abdel-Kader）是IMF对外关系部的经济学家。

竞争力的
恢复有助于
墨西哥重新
获得被中国
占领的美国
进口市场的
份额



失而复得

墨西哥蒙特雷一家医疗设备工厂的工人正在工作。

赫尔曼·卡米尔、杰瑞米·祖克

对于墨西哥来说，美国市场的重要性由来已久。美国不仅是墨西哥制造业产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更对其整体经济实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约 20 年前，墨西哥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从此美国市场为该国的制造业带来了巨大收益，协议签订五年后，墨西哥制造业在 GDP 中的占比就增长了约 4 个百分点，在美国制成品进口市场的份额从 1994 年的约 7% 上升到 2001 年的近 13%。

但中国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墨西哥的命运急转直下。中国加入 WTO 后降低了许多出口壁垒，且由于中国制造业成本较低，产能充足，使其在竞争中迎面赶上。虽然墨西哥由于加入北美自贸区在对美贸易上占据优势，但在美国市场的出口份额依然大幅下滑。2001—2005 年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总额以年均 24% 的速度上升，同时墨西哥的出口增长从此前的年均 20% 大幅下降至 2001—

2005年的年均3%。因此，中国在美国制造业进口中的份额在2005年翻一番，抢占了墨西哥的市场份额。

中国之所以能将墨西哥挤出美国市场，是因为墨西哥已在其原本占优势的制衣、办公机械、家具以及摄影和光学仪器等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丧失优势。许多制造商，包括一些知名的跨国企业（其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制成品后出口到美国）为降低劳动力成本，都将企业从墨西哥迁往中国。

但正如其失去市场份额时一样，墨西哥又快速站稳脚跟并开始努力收复失地。过去七年中，墨西哥制造业在美国市场上首先挤出日本和加拿大的竞争者，然后在近几年中又抢占了中国的市场份额，最终由占美国进口市场11%攀升至并保持在14.4%的高位。2005—2010年间，墨西哥和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都在上升。但是2010年后，墨西哥在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继续上升，而中国的份额开始下降。

墨西哥的回归

墨西哥出口美国的制造业夺取市场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电信以及交通运输设备等。2005年后，墨西哥在美国交通运输和通信领域进口产品中的比重稳步回升至18%，占墨西哥2012年上半年制造业出口总额的76%。但自2009年起，26项制造业进口目录中的20项份额上升，占墨西哥出口总额的80%。只有电器（仍是墨西哥主要出口行业，占出口总额的14%）和制衣等屈指可数的几个行业市场份额在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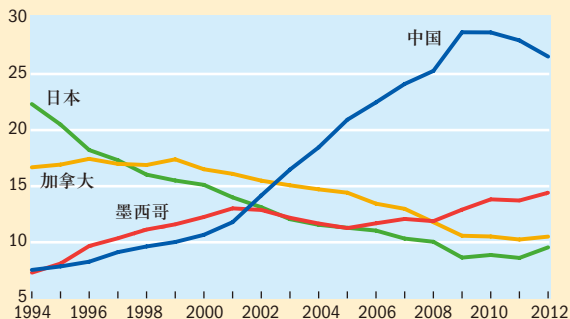
汽车工业市场份额的上升是墨西哥市场总份额增加的主要原因，占2005—2012年间整体市场份额增

加的一半。在此期间，墨西哥在美国汽车、汽车零部件以及配件（除轮胎外）进口中的市场份额上升了约9个百分点，尤其是2009年后上升势头更加明显。现在，墨西哥在美国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为1/5，是美国汽车相关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国，仅略低于加拿大。汽车行业占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的制成品的出口总额的1/4。墨西哥产能和出口的提高应归功于外国直接投资持续进入该领域，主要是美国资本的进入，近期也有来自日本和德国等国。

图2说明了2005—2007年和2010—2012年两个时间段中，墨西哥和中国的26个制造行业在美国进口市场中份额变化的对比。我们排除了2008年和2009年，因为这两年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扭曲。每个图中，左上方（红色圆）代表中国市场份额上升而墨西哥市场份额下降的行业；右下方（绿

图1
份额转移

中国加入WTO后，墨西哥在美国制成品进口市场的份额在下降，但近几年随着中国份额的下降，其份额又在回升。
(美国制造业进口的份额，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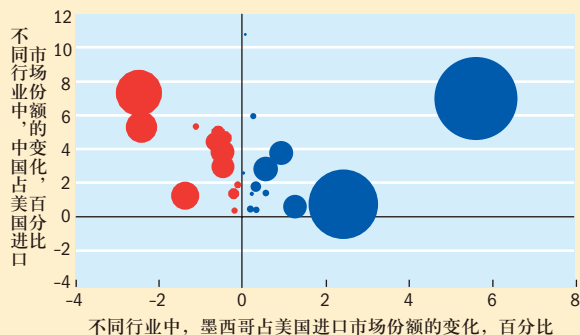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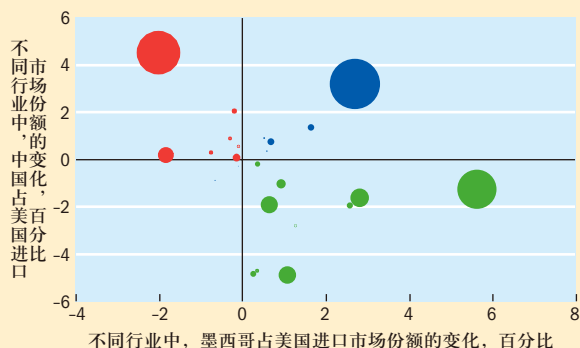
图2

命运变换

2005—2007年间，没有行业在美国进口中墨西哥的份额上升而中国的下降。



2010—2012年间，开始出现变化。



资料来源：IMF基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6类制成品数据作出的估算。

注：左上方（红色圆）代表中国市场份额上升而墨西哥市场份额下降的行业；右下方（绿色圆）代表墨西哥市场份额上升而中国市场份额下降的行业。右上方代表两国市场份额都下降的行业，左下方代表两国市场份额都上升的行业。圆的中心是墨西哥和中国的交叉点，圆的大小表示这一时间段内各个行业在整体市场份额变化中的贡献。

色圆)代表墨西哥市场份额上升而中国市场份额下降的行业。右上方和左下方则代表两国市场份额都下降或上升的行业。圆的大小表示各个行业在整体市场份额变化中的贡献。2005—2007年间(上图),没有哪个行业墨西哥市场份额上升的同时中国的市场份额在下降。实际上,有些行业墨西哥的市场份额在下降,而中国的市场份额在上升。相反,2010—2012年间(下图),墨西哥的市场份额上升而中国的市场份额下降的行业有许多。

考虑到其他竞争者份额的变化,我们计算了墨西哥市场份额上升可能与中国份额下降有关的比重(基于Jorge Chami Batista 2008年开发的方法)。2010—2012年间,墨西哥市场份额上升的行业总营业额的40%受益于中国市场份额的损失,其中一些也反映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变化。墨西哥由于中国而在美国市场收益的行业非常广泛,包括电气器械及建筑物资等。相反,2005—2007年间,墨西哥市场份额上升的一半主要由于加拿大和日本份额的下降,而非中国。

墨西哥竞争力上升

墨西哥在美国市场的回归反映了本国竞争力的提升和发展使中国出口商品失去价格优势。这些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是墨西哥和中国劳动力成本间的差距逐渐在缩小、墨西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越洋运输成本上升。墨西哥对专利权的保护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也成为鼓励制造商将厂址迁往墨西哥的重要原因。

2003—2011年间,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以人民币计算,以年平均14%的速度增长,而以美元计算

增速则为20%(反映了名义工资的增长和中国货币的升值)。相反,墨西哥制造业的平均工资由于工资微弱增长而比索贬值,以美元计算基本保持不变。2003年,以美元计算,墨西哥的平均工资比中国高6倍;而2011年仅比中国高40%。这使中国21世纪前几年曾拥有的作为美国制成品低价供应者的竞争优势下降(由于缺少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可靠数据,我们无法解释制造业生产率的变化以及对工资变化的作用)。

我们也发现,2005—2007年间,墨西哥相对中国抢占市场份额的行业中,劳动力发挥的作用要大于资本,如家具、制铅业、供暖、照明装置等行业。这正好符合墨西哥相对于中国市场份额的上升是得益于更具优势的劳动力成本这一推论。相反,2005—2007年间,相对市场份额的变化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没有系统性关系。

此外,由于大量投资进入墨西哥制造业中,生产率得到大幅提升,有益于降低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同时提高制造业生产的竞争力。

地理位置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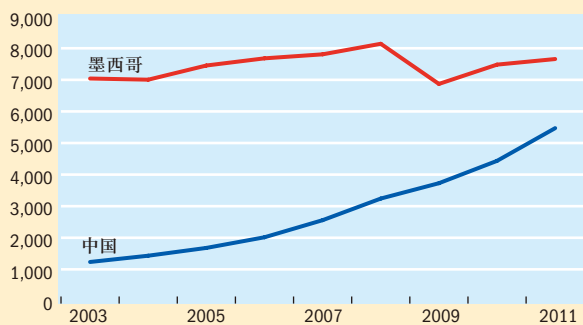
墨西哥也因地理位置距美国较近而略占优势。由于原油价格从21世纪前几年的每桶25美元上涨至2013年2月的100美元,使越洋海运价格大幅飙升。这让墨西哥比中国更具竞争力,尤其是对于那些对时效要求很高的商品和重量高体积大的物品。

例如,墨西哥在2009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平面出口国,超过韩国和中国。全球贸易数据库(全球贸易信息服务)显示,墨西哥也是两开门冰箱的最

图3
两国工资渐渐接近

通胀率和汇率调整后,2003年墨西哥以美元计算的的实际年均工资比中国高六倍,2011年只比中国高40%。

(以美元计算的的实际年均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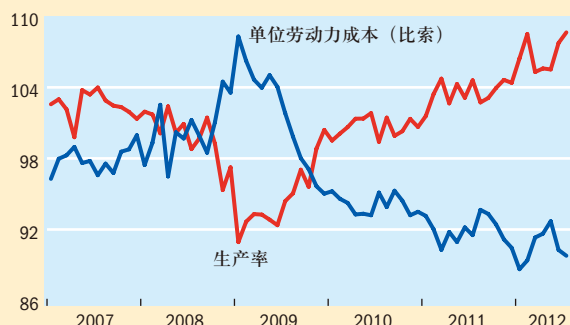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巴克莱银行,香港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中国数据库。

图4
有效的企业

墨西哥制造业中,单位工人的产出(生产率)在上升,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在下降。

(指数,2008年=100)



资料来源:INEGI(墨西哥国家统计局与人口局)。

大制造国。距离较近可以迅速到市场采购也具有很高的重要性。由于美国公司越来越通过采购而非自己生产零部件等，从而使仓储费用降低，这种及时加工的趋势要求及时准确送达。这对于墨西哥供应商更容易做到。

据美国 2011 年制造业外包成本指数 (AlixPartners, 2011 年) 显示，对于 2010 年美国进口商来说，在所有低成本外包国家中，墨西哥生产的商品到岸成本最低（即加利福尼亚港口价格）（见图 5）。同时，美国制造商开始要求他们的提供零部件的供应商保持距离较近，采购时选择较近的资源而不选择较远的资源，这提高了墨西哥作为距离较近的制造中心的作用。同时，非美国公司也从中国撤离，将他们的生产基地迁往墨西哥。

墨西哥对专利技术的有力保护也有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对效率大有裨益。墨西哥在保护国际知识产权、专利、商标权等方面拥有良好的口碑。参与了多项国际条款，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这有助于降低盗版、仿制品及其他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风险，这对高技术行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尤为重要。2012 年 1 月，墨西哥加入《瓦森纳安排的出口控制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品及技术》，为美国和欧洲公司到墨西哥在高技术行业投资打开了新的机遇，包括半导体、软件、航空、激光、传感器和化学行业等。

墨西哥的制造基地也由于其经济开放而得到加强。墨西哥的贸易协定网实际是最大的，已与 44 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和优惠贸易协定，在避免使用贸易限制、确保无障碍进入市场以及中间环节部件顺利进入在墨西哥运营的公司。此外，墨西哥还签署了促进本国制造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的国际标准和高品质

协议，尤其是在自动化和航空工业。

墨西哥竞争力的提升是由多个因素作用的结果，美国市场份额的复苏可能也将持续，或者说结构性的，正如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这些因素包括地

墨西哥对专利技术的保护增强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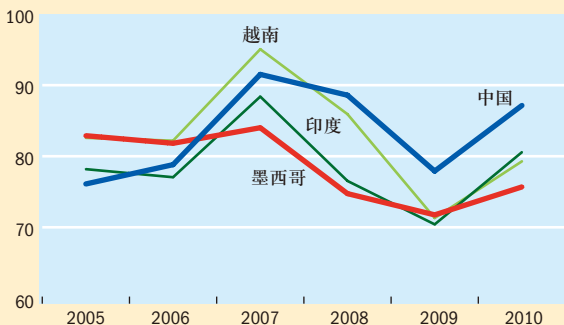
置优势，由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使单位劳动力成本有所改善以及贸易开放等，这些因素是墨西哥近年来在美国市场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中国的制造能力成熟且将生产转移至海外的成本较高，中国对于美国进口的许多商品来说，依然是低成本制造的主要基地。为此，墨西哥应继续进行结构性改革，以进一步促进生产率和投资，保持加工出口的活力，促进潜在 GDP 的增长，如采取措施提高竞争和劳动力灵活性、发展教育、加强法律效力等。

墨西哥的制造业曾因 21 世纪初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而受到重挫；今天，中国许多成本优势已消失殆尽。墨西哥制造业将因全球格局的变化而受益。■

图5
最廉价的

在所有主要的低成本资源出口国中，墨西哥向美国消费者出口的成本是最低的。

（土地在美国国内制造业成本中的占比，百分比）



资料来源：AlixPartners咨询公司。

赫尔曼·卡米尔 (Herman Kamil) 是IMF西半球部高级经济学家，杰瑞米·祖克 (Jeremy Zook) 是该部门研究助理。

本文基于 IMF 2012 年墨西哥文选 (2012 Selected Issues Paper for Mexico) 第 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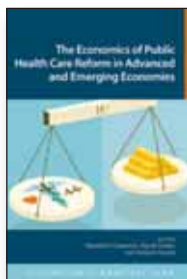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AlixPartners, 2011, U.S. Manufacturing-Outsourcing Cost Index. www.alixpartners.com/en/WhatWeThink/Manufacturing/2011USManufacturingOutsourcingIndex.aspx

Chami Batista, Jorge, 2008, "Competition between Brazil and other Exporting Countries in the U.S. Import Market: A New Extension of Constant-Market-Shares Analysis," *Applied Economics*, Vol. 40, No. 19, pp. 2477-87.

Global Trade Information Services, Global Trade Atlas. www.gtis.com

扩展你的经济视野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公共医疗卫生改革经济学》

Benedict Clements、David Coady和Sanjeev Gupta编

在未来几年，对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医疗卫生改革都将是其财政政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本书对这些挑战和潜在的政策回应

提出了新锐的见解，并提供了国别分析和案例研究。

45美元，英文，© 2012，408页，平装
ISBN 978-1-61635-244-8，Stock# SCHP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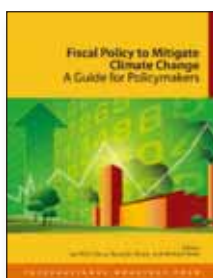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公共养老金改革面临的挑战》

Benedict J. Clements等

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养老金改革都位于政策议程的重要位置。本书通过研究不同的养老金模式以及分

析养老金支出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前景，帮助IMF成员国努力完成与养老金相关的挑战。

33美元，英文，© 2012，84页，平装
ISBN 978-1-61635-413-8，Stock# S275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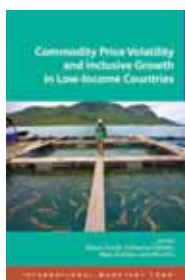


《减缓气候变化的财政政策：政策制定者指南》

Ian W. H. Parry、Ruud A. de Mooij和Michael Keen

本书为设计减少温室气体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实用的指导方针。书中各章由该领域主要的专家撰写，阐述了财政政策优于其他解决途径的例子，如何实施这些政策，最有可能实现的气候融资财政工具以及从先前的政策实践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28美元，英文，© 2012，218页，平装
ISBN 978-1-61635-393-3，Stock# DFPM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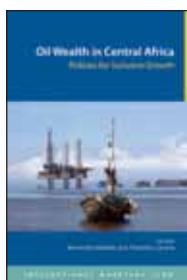
《低收入国家的商品价格波动与包容性增长》

Rabah Arezki、Catherine Pattillo、Marc Quintyn和朱氏

本书阐述了低收入国家面临的商品价格波动的挑战，并探讨了应对商品价格冲击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选项。同时，本书还探讨了商品出口

国（尤其是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政策，以解决不平等现象。

35美元，英文，© 2012，408页，平装
ISBN 978-1-61635-379-7，Stock# CPVI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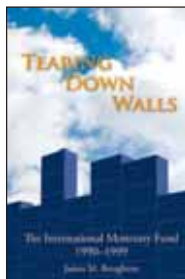
《中非的石油财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政策》

Bernardin Akitoby和Sharmini Coorey编

尽管其石油资源丰富，中非仍在为维持强劲的包容性经济增长挣扎。基于新的研究，指出该地区面临的宏观经济挑战，分析了石油财富管理及其对减贫的影响。同时，本书还包含了

四个案例研究，以说明已汲取的经验教训。

25美元，英文，© 2012，240页，平装
ISBN 978-1-61635-376-6，Stock# OWCAEA



《拆掉围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1999年》

James M. Boughton

本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系列的第五册。书中阐述了动荡的20世纪90年代，IMF面临的严重挑战及其扮演的更广泛的新角色。IMF面对这些挑战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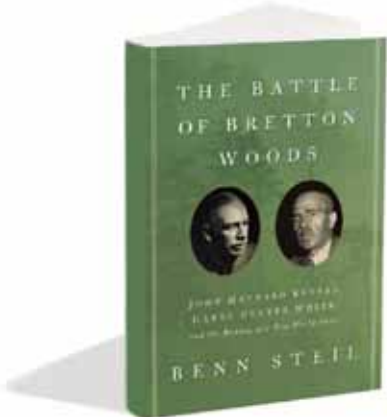
挫折为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90美元，© 2012，992页，精装
ISBN 978-1-61635-084-0，Stock# TDWIEA

www.imbookstore.org/fdm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粉饰历史



本恩·斯泰尔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战斗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创建新的世界秩序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3年，472页，29.95美元（精装）。

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标志性会议，使得该旅游胜地的名字成为国际货币合作体系的同义词。虽然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但即便是其主要起草者，都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

英国谈判代表、知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未能创建出他所预想的履行“超级中央银行”功能的IMF，深表失望。美国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认为，IMF在开始的几十年内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温和中介机构的角色。1970年，美国财政部发言人爱德华·伯恩斯坦在布雷顿森林反省道：“国际货币体系并未达到最好效果”。

毋庸置疑，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回顾，应该涵盖这种对于该体系及其影响的质疑。然而，本恩·斯泰尔（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部高级研究员、主任）表

达了激进的观点。该作者详述了怀特作为一个所谓的秘密特工，不仅向前苏联传达美国的战后政策，而且（据斯泰尔所说）也为前苏联工作，将美国卷入二战。在作者的笔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确保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叫做“经济启示”这种东西的诞生，而怀特就是其构架师。

在前苏联的档案中，有充足证据显示，怀特暗中将机密泄露给前苏联情报局，虽然不可能知道究竟泄露了多少，也不知道前苏联是否大量使用。即使是同情怀特的历史学者们，大多数都承认他涉足间谍活动。但是，斯泰尔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认为怀特代表前苏联的利益，在1941年实质性地参与撰写美国外交照会，该照会包含一些明显不能被日本接受的条款，致使日本不得不撕毁协议、袭击珍珠港，从而把美国卷入战争中。

有很多理由来质疑该断言。不管是怀特本人或是财政部，都不是美日谈判的核心。在该假定的关键照会的当时，日本前往珍珠港的舰队已经在海上准备就绪。斯泰尔用于支持其论点的2002年历史事件本身，其实源于一套卷宗，而这套卷宗已被历史学者约翰·伯爵·海恩斯和哈维·克莱尔判定是造假的一套卷宗。

除了怀特的间谍活动外，斯泰尔还在书中的其他地方基于不充分证据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在讨论到货币政策时，斯泰尔提到“1914年前的金本位制，具有规范信贷价格和跨境黄金流动的自动调节机制”，并大加赞誉。这个说法虽然和金本位制可能运作的经济模式相符合，但并未基于史实体现出其实际运作方式。

即使在金本位制下，纸币仍然是主要的流通介质。发行纸币的中央银行并没有自动地遵循某种原则，根据交易流量来调节流通货币的数量。相反，货币管理当局是通

过设置利率水平来控制流通货币的数量的，而该利率的设定取决于他们认为是否可以产生足够的利润，他们的政府是否可以放心地借贷以及他们是否可以保持足够的金储备量，以对纸币转换为铸币的需求进行可靠承诺。

布雷顿森林带来的不是完美体系，而是国际协商的惯例。

也就是说，金本位制也好，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好，都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良好判断力。斯泰尔的意思是，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体系，进而到现代浮动汇率体制，世界从一个自动规则的时代走向了易受政治影响的全权决策时代。实际上，所有的货币体系都会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差别来自于政治环境，而非体系或体制本身。布雷顿体系以及现在浮动汇率体制，相比起金本位制时代来说，只是受到了更多的民主政治影响。

假设，斯泰尔没有把布雷顿森林体系说成对实现“经济启示”的保障，而是说，正如该体系所构建的那样，并不能永久持续下去，那么他的观点就不会是错误的，而该书给人的感觉也会更好。根据原体系的要求，美国要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让世界公民都持有美元，同时维持每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名义兑换率，这两项都不可能持久。不过这种必然结果是该体系成功，而不是失败的标志：因为毕竟其目标并不仅是货币可兑换，而是复兴和开发。一旦世界的重建完成、变得更富有，以美元为中心的需要也就不在了。曾经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也就变成多边的体系。随着特别提款权（这是一种真正的储备资产）的建立，

IMF 开始跟凯恩斯提出的超级中央银行越来越像了。虽然，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 1971 年已终结，但是其基于共同繁荣的利益的国际货币管理目标保留了下来，即使在这点上理论多于实践。

经济历史学者迈克尔·博尔多在对多种货币体系下的国际经济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比其他的体系（包括金

本位制）表现要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经济体享有稳定、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高速的增长。博尔多评论说，现代浮动汇率体制也不错，但比起布雷顿森林体系来，允许更大的本土政治自由裁量权。布雷顿森林带来的不是完美体系，而是国际协商和临时协调的惯例。这种遗产必将开启一个对于世界的货币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 IMF

将走向何处的思考。

埃里克·罗威
(Eric Rauchway)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教授
《造钱机：从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的繁荣创造》(The Money-Makers: The Invention of Prosperity from Bullion to Bretton Woods) (即将出版) 作者

卸下华服的银行



阿娜特·阿德迈提、马丁·赫尔维希

银行家的新装

银行业，你怎么了？我们该拿你怎么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3年，392页，29.95美元（精装）。

紧随着最近的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成为一个热议话题；出现了众多的复杂提案，大量的新名词和机构也把人搞得头晕眼花。然而，在阿德迈提和赫尔维希的新书中，他们对于解决过度、未受监管借贷问题的一个经典而简单的方案——提高银行资本比率——给出了强有力

的支持。

所谓“提高”，阿德迈提和赫尔维希的意思说是设定资本比率为 20%—30%，超过最近巴塞尔协议 III 中建议水平的两倍，当然还得看是怎么计算的。他们的论证对于关于资本监管的辩论是个重要贡献，不过也存在一个关键的缺陷，接下来我将会提到。

关于提高资本比率，或者说银行资本相对于其风险的比率的基本讨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如果银行的破产会对我们其他人有外在的影响，那我们就应该寻找减少这种破产和其经济影响的途径。提高资本比率，有时也叫“降低杠杆率”，是维护银行安全的合理途径。打个比方来说，由于驾驶员高速行驶过程中的过失有对行人和其他驾驶员造成严重伤害的风险，就要对高速路进行限速规定。

作者进一步阐述此原理，非常令人信服地提出：在几个方面，政府行为使银行过度风险的问题进一步恶化。首先，通过制定有利于负债，而不是产权的税法，鼓励银行间更高的杠杆率。其次，通过挽救破产银行的债权人，政府降低了银行负债的事前成本（和自由市场相比）。最后，政府降低银行破产对于经理人和债券所有人事后成本的政策，鼓励了对风险的承担。

以上论点说明提高资本比率是

有益的，因为资本状况良好的银行会面临较低的破产危险，从而减少对其他人的外在影响。不过代价又是什么呢？还以高速路来打比方，如果我们把限速降低到每小时几英里，那么不良驾驶的对外影响就非常的低了，但是代价是不可能合理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业界对于资本要求的普遍反对之声，就出于此安全性相对于增长性的论调。本书的贡献在于有力地驳斥了这种普遍意见。

反对提高银行资本的第一个理由是，减少了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从而降低了增长率。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该意见在缺乏经济常识的人们之间极其普遍，他们混淆了“资本”和“储备”的概念，从而引起这种误解。对于银行来说，资本无非是资产负债表右侧的权益组成部分，原则上跟资产负债表左侧资产是如何投入的毫无关系。而另一方面，储备表示处于闲置状态的现金。资本和储备是不同的，不应该在此辩论中相提并论。

反对提高银行资本的第二个理由是，由于市场相对负债而言，对于产权有更高的回报要求，这样迫使银行持有更多产权，会增加银行整体的资本成本，而该成本会转嫁到整个经济体中。这显然和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不相吻合，该定理说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假定条件

下，一个企业的价值和其融资方式无关。作者非常清晰地向他们预期的（外行）读者解释了该定理背后的道理，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本人曾很多次尝试，但都不是很成功，我计划下一次会使用本书中的一些解释。

对于本书，我唯一的批评是它过于狭隘地针对“传统”银行，而对于传统银行的监管工具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监管者已经可以对于银行实行（至少试图试行）资本标准。但最近的经济危机是在所谓影子银行业领域开始和加速，这是

一个在证券化、购回协议和其他短期货币市场等方面都较少监管的领域。毋庸置疑，如果我们打算仅对传统银行提高资本要求，而对影子银行业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整个金融体系的更多部分就会转移到影子行业，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体系的不稳定。即使对于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小小偏离——这在实际中肯定是存在的——都会引起远离传统银行业的严重监管套利行为（实际上，经济危机前影子银行业的增长就是归咎于这种处于边缘上的监管套利）。

作者在本书结尾处确实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对于问题的规模太过小视。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存款都强制存放在传统银行的世界里，我们就可以只关注这些银行的安全性。但是在真实世界中有多条并行的高速路，仅对其中一条限速，只会导致其他道路过分拥挤的灾难。

安德鲁·梅特里克
(Andrew Metrick)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和管理系迈克
尔·H. 乔丹教授

铃声响于 变化中



罗宾·杰弗里、阿萨·多伦

印度电话大全

哈佛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2013年，336页，29.95美元（精装）。

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金融公司宣布，移动电话网络是“一部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机器”。在本书中，一位历史学者和一位人类学者阐述了电信产业对于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是一本适合学生、社会学者和商业管理者仔细阅读的重要著作，而且任何对于变化本身及变化带来的对发展和复杂社会造成的影响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阅读本书。

作者证明了官僚和政治领袖试图抵抗、阻碍或者控制强大电信主宰力带来的变革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这一点在印度、美国和欧洲当局对3G技术频段进行高额拍卖的尝试中得到了印证，这是一种阻碍和推迟对于下一代无线技术4G和LTE的引入及投资的错误行为。有一些意见认为，政府有责任将此种业务的收入最大化。然而，如果在一种短期收入最大化的尝试中，政府降低了运营商快速而及时地对新技术进行资本投入的能力，将最终损害到社会利益。可供投入的资本原本就不足，而过度地榨取运营商会形成阻碍和延迟，并将最终增加消费者所付出的成本。一个随着时代应运而生的理念是不可阻挡，也不应该被耽搁的。

杰弗里和多伦决定聚焦于印度，这里移动电话的传播发展之迅猛，超过了世界任何其他地区，而且其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使

研究能更令人满意和更有成效。然而，印度的经验教训并不仅限于这片广阔的次大陆。在印度各个不同区域市场的众多运营商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对于我自己的公司Digicel来说，在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如海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的完全不同的市场也遭遇过。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拥有异乎寻常的多文化的巨大市场，全国有超过800种完全不同的方言，仅隔几百码的村落间大批的男女老少互相不能进行语言沟通。这是一片道路状况很差，甚至有的地方完全没有道路的荒凉土地，这使基站的建设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就像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印度巴帝电信（Bharti Airtel）一样，需要正确获取市场信息，为手机和SIM卡开发预付计划和合适的分发模式。

正如印度那些成功的运营商，我们没有把运营国家的目标市场局限在富裕群体和区域上。通过与政府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快速渗透到这些国家最艰苦的地方，比如牙买加的蓝山（the Blue Mountains）、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the Highlands）以及海地的边远农产区

域和物质匮乏地区。

同时，正如作者所指出，廉价的移动电话成为穷人能够大幅度提高生活品质、创造谋生机会的一种武器。然而，如果没有印度运营企业的创业热情，这种改善就不会发生得那么迅速、显著和有效。他们的市场开发水平和技术能力所付出的对象是一群在此之前没有机会发挥自身潜力的普通大众。

这些运营商意识到，电信是大众的技术。截至2007年，印度的移动电话行业在电信服务领域雇佣了250万名员工，不包括从事维修和二手买卖的那些最具创业和创新精神的工人。

这个变化繁荣了广告和市场公司，给软件开发者带来更多机会，也为那些以前从未有此种机会的人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让他们能从事到无线电规划设计和基站建设这样的行业中。

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论及电信

服务的消费模式，也印证了我们的自身经验。我们发现，萨摩亚和印度喀拉拉邦的渔夫对于移动服务有相同的使用方式，他们为海上勤务

廉价的移动电话成为穷人能够大幅度提高生活品质、创造谋生机会的一种武器。

的伙伴提供捕捞后登陆的最佳港口的信息，提供天气状况的信息，进行紧急情况下的求助呼叫，还共享某特定时间最佳渔场的信息。无论是在印度、牙买加，还是在海地，小型制造商都通过移动电话服务，加强了他们跟市场的联系，更容易获取市场价格，从而更具竞争实力。


书中有个章节谈到关于廉价移动服务对于女性的影响，那些前景恐怕过于乐观，因为在这个国家，由于文化背景的原因，在这方面的转变是缓慢的。作者描述到廉价移

动电话具有特殊的效力，能给穷人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正如他们所说，这种趋势是“不可预期，但是值得观察和研究的”。

作者补充道，本书八章中的每一章都可以作为一本独立的书来阅读。他们说得很对。他们非常成功地做到了撰写这本书时的初衷——“兼具学术性、悦读性和通俗性”。

丹尼斯·奥布莱恩
(Denis O' Brien)

Digicel 集团主席、Frontline (人权捍卫者国际保护基金会) 主席和创始人之一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Robert Mundell, Arvind Panagariya, and many others.

A 14-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 three-month capstone internship at the World Bank, IMF, or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

The 2014–2015 program begins in July of 2014.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5, 2014.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www.sipa.columbia.edu/academics/degree_programs/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



具有包容性的非洲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获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

过去 10 年间，非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得益于其持续的商品繁荣、有利的人力资源、良好的经济政策以及总体上有了改善的政治稳定。同时，经济的增长也使得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开始使用金融服务。尽管获得金融服务面临的主要挑战依然存在，但人均 GDP 的增长与商业银行存储业务的增长间还是存在巨大的相关性。

不可否认的是，在金融包容性方面的这种进步是基于很低的起点，而且各国间的发展情况差异巨大。然而，在 2004—2011 年，非洲是全球各地区中储蓄业务增长最快的地区（以每千个成年人获得储蓄服务的数量衡量）。在储蓄业务方面，非洲已经赶上中东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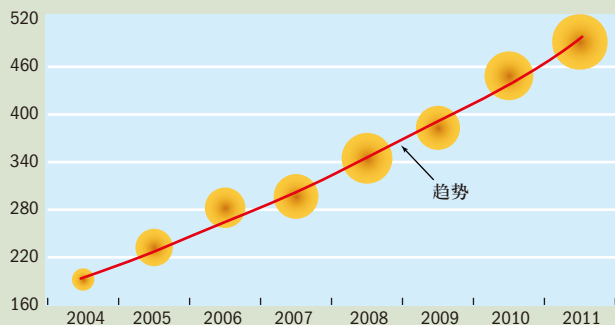
亚地区，而且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差距也在缩小。

该地区其他类型的金融中介机构数量在 2004—2011 年间也出现增长。这些中介机构包括信贷协会、金融合作社、小额信贷机构、农村银行、储蓄银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投资公司、金融公司以及租赁公司。

总的来说，尽管各国间、城乡间存有差异，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量在 2004—2011 年均出现增长。商业银行数量在这期间增加了 70%，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加了近 50%。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在 2007—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下降，但在 2010 年就开始反弹增长。

2004—2011 年，非洲的 GDP 和人均商业存款额均出现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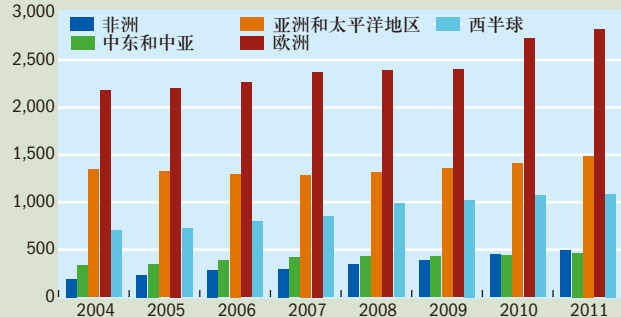
（每千个成年人的商业银行存款额）



注：图中圆圈的大小代表人均 GDP 增长的大小，2004 年=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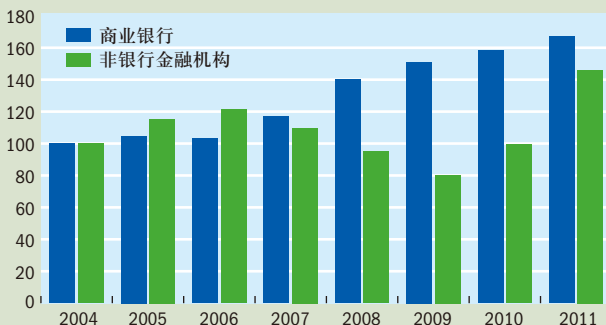
在成年人拥有商业银行账户方面，非洲正在缩小其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差距。

（每千个成年人拥有的商业银行账户数）



非洲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幅增加。

（每 10 万成年人所拥有的分支机构数量的增长；2004 年=100）



注：样本国家占非洲 GDP 的约 80%。

有关数据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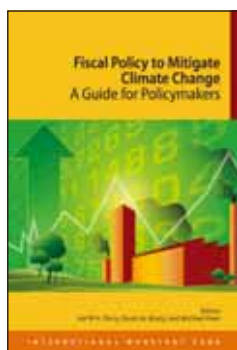
IMF《获取金融服务状况调查》数据库 (fas.imf.com) 包含 187 个行政辖区在 2004—2011 年的年度数据及元数据，可通过 IMF 数字图书馆免费获取 (www.elibrary.imf.org)。2012 年的调查是与国际金融公司、扶贫协商小组共同进行的。它有 4 万多个时间序列，包含基本消费者获取金融服务状况指标，涵盖了信贷协会、金融合作社、小额信贷机构。对于小型和中型企业、家庭、人寿保险公司和人寿非保险公司进行单独分类。荷兰外交部、澳大利亚国际发展局提供了资助。

本文由 IMF 统计部的卢卡·艾瑞克 (Luca Errico)、格伦·艾美芝克 (Goran Amidzic) 和亚历山大·玛沙拉 (Alexander Massara) 撰写。

拓宽你的全球专业知识 访问IMF在线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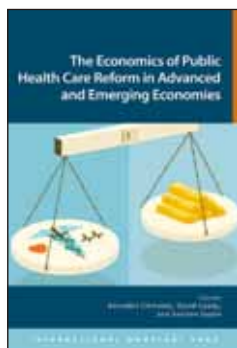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公共养老金改革面临的挑战》

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养老金改革都位于政策议程的重要位置。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主要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未来公共养老金支出增长受到的牵制。而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挑战通常非常棘手。本书研究了公共养老金支出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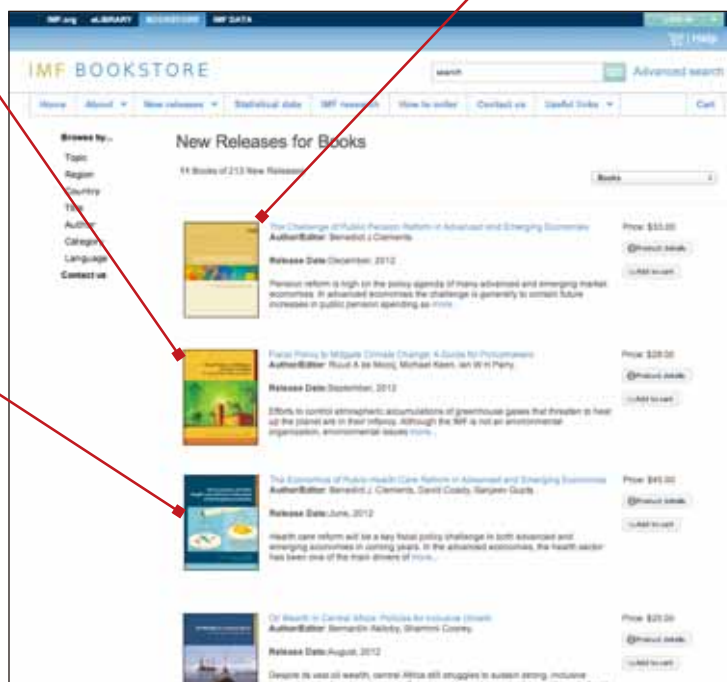
《减缓气候变化的财政政策：政策制定者指南》

温室气体对地球气温的升高产生威胁，而控制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积累的努力目前尚处在初级阶段。尽管IMF不是一个环保机构，但环境问题仍然影响着该组织的使命，因为其对宏观经济绩效和财政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本书为设计减少温室气体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实用的指导方针。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公共医疗卫生改革经济学》

本书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未来将会面临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挑战提供了潜在的政策回应，并给出了新锐的见解。在发达经济体，医疗卫生是政府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将是在不破坏财政的可持续性前提下，如何扩大公共参保范围。



现在通过www.imfbookstore.org/fdm订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Finance & Development, March 2013 - Chinese \$8.00



MFICA2013001